# 毛 泽 东 选 集

## 第 六 卷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毛泽东选集

## 第 六 卷

润之赤旗 主编
二零一八年 • 一月



毛泽东

# 第六卷说明

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理论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发展，是世界共产主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锐利武器。编辑出版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致企盼。

1976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虽得以出版，但是仅仅发行了数年就被禁止了。而收载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余革命著作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著作的第六卷、第七卷更是无从谈起。这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莫大遗憾。

出尔反尔、半途而废绝不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做事风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1]尽管按照中共中央 1981 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有所谓的“错误”，但是，即使真的存在这些“错误”，我们共产党人要做的，也应该是面对和分析，而绝不是严加封存、不予公开。再者，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也该到作出一个更公正决断的时候了。

为了更公正地把经得起拷问的历史交给伟大的人民，我们参考建国以来出版的各类文献集，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以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出版物《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的党内文献、报刊，网络上的《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革命友人静火同志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卷等资料，选编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编为这部《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卷。本书是第六卷，收录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重要著作，包含讲话、谈话、文章、书信、批示等一百一十一篇。

在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对 50 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雏形进一步完善；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宝库；对当时一线领导人鼓吹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逆风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对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妄图遏制社会主义力量而进行的反华反革命活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学习这些著作，对同志们领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疑会起到莫大的作用。

本卷中，各篇著作一律按照第一次发表所在的文献集刊印。对于一些短篇文稿，我们按照内容进行了归类合并，方便同志们阅读。文献的标题、题解、注释，一部分按照原书，一部分由我们拟写、改写。对于一些文稿，我们做了技术性的整理和人名的核订。

这部选集选编匆忙，错漏在所难免，还请同志们提出指正意见。

**润之赤旗**
二零一八年一月

**注 释**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 目 录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八年一月）......3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4
一 一月三日的讲话......4
二 一月四日的讲话......5
***关于国内各项政策和国际问题的短篇指示汇编**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10
谈学生健康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10
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10
谈妇女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10
农、林、牧三业要结合（一九五八年三月）......11
好好研究煤的综合利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1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11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九五八年六月）......11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11
群众的检举很有作用（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12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一九五八年）......12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视察多地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12
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13
谈游泳（一九五八年九月）......14
对两份关于国际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14
全民皆兵（一九五八年十二月）......14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5
实事求是，不要浮夸（一九五八年）......15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节录）（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
......15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16
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17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18
谈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18
谈中印关系（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19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20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20
谈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22
对张闻天信的批示（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23
对彭德怀信的批语（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23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23
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一九六〇年一月）......24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24

在上海会议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25
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26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26
主观主义害死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27
调查成灾一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27
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27
不得人心，武器再强也不免失败（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27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月、六月）...........................................................................................................28
不靠原子弹、氢弹取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29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30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32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33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十一月）...........................................................................................................35
对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38
工业部门学解放军（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38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39
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一九六四年一月）..................39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39
现在的苏联是希特勒式的专政（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40
关于保健的一段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40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40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一九六四年八月）..............................43
在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43
不能怕麻烦（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43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43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44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十二日）..............................**49**
一 一月十一日的讲话.........................................................................49
二 一月十二日的讲话.........................................................................50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54**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55**
**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59**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61**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68**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修改**（一九五八年二月）......................**77**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78**
**一批按语**（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102**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插话**（一九五八年四月）..........................................**103**
**介绍一个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110**
**临时通信**（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111**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112
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130
毒草是要锄掉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131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132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135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136
介绍一封信（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143
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144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46
把握打金门的时机（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53
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修改（一九五八年八月）……154
同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155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一日、三十日）……162
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一九五八年八月）……175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176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186
巡视长江流域数省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7
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189
一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89
二 国内大跃进形势……190
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194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1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196
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197
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199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六日、七日、九日、十日）……200
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214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215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229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241
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242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243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245
对《张鲁传》的批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251
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252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55
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259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260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264
**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267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269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五日）........270
一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270
二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274
三 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277
四 三月一日的讲话........281
五 三月五日的讲话........283
六 讲话........288
**郑州会议纪要**（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289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290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292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294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295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299
**工作方法十六条**（一九五九年四月）........301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305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309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316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318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320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321
**同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325
**同安东诺夫的谈话纪要**（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327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330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333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335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372
**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374
**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376
**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378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380
**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382
**接见非洲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384
**十年总结**（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389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391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392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394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397
**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401
**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404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412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413
**从现在起要年年讲阶级斗争**--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426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430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432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433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436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438
**谦虚——戒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440
**春节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444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九六四年二月-一九六五年十月）……450
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二月）……450
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450
要自学，靠自己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450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451
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453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456
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457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谈话（摘录）（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457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459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460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461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463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466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473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480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是尖锐对立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484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486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九六五年五月）……497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500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501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503

**第六卷后记**……507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

# 在杭州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五八年一月）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

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注释**

[1] 杭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集的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

## 一 一月三日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匹，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为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1]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水，2．肥，3．土，4．种（优良品种），5.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7．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畜牧，9．副业，10．绿化，11．除四害，12．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副业，5．林业，6．渔业，7．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科学，11．文教，12．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比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

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2]，《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 二 一月四日的讲话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达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友兰的一篇文章[3]，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他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质。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

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米，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4]是个好报告。（有人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做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十五年就行。十五年加八年，共二十三年，不用四十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

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5]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他还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6]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土地革命，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还有技术革命。

1——4 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 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

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不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的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多少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此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导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线划得那么清楚。

## 注释

[1] 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决口夺淮。由于长期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淮河流域水系混乱，河道排水不畅，洪涝水缺乏出路。这些自然、历史条件使淮河流域成为一个水旱灾害频繁的农业低产地区。1950 年，我国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建立治淮机构，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治理工作。至 1985 年，国家为治淮投资 77 亿元，加上地方投资，累计不下 200 亿元。完成土方 76 亿立方米，混凝土 1000 万立方米。经 30 多年治理，初步控制水旱灾害，生产面貌明显改变。

[2] 《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1957 年 12 月 31 日发表于《浙江日报》，文章指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在它的鼓舞和激励之下，人们能够发挥出无限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今年，由于进行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由于在农村中进行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社会主义的正风压倒了资本主义的歪风，更给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创造了思想上和政治上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人们的思想上，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对立思想的斗争。有勇气、敢作敢为的人，是我们事业的“促进派”；没有勇气、怀着无穷忧虑的人，是“促退派”。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我们党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中都应当是促进派，而

不应当是促退派。

[3] 此处可能指《哲学研究》1957 年第 5 期上李达的《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和冯友兰的《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两篇文章。李达（1890 年 10 月 2 日－1966 年 8 月 24 日），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 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中共一大被选为宣传主任。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第一、二届政协委员等职。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冯友兰（1895 年 12 月 4 日～1990 年 11 月 26 日），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

[4] 指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写的，说的是同时种试验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红安县的经验。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5] 刘传友，时任中共山东寿张县委书记。

[6] 即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 年 11 月 7 日—1940 年 8 月 20 日），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1917 年 11 月-1918 年 3 月任外交人民委员、1918 年 3 月-1925 年 1 月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 年 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 11 月被开除出党。1929 年 1 月被驱逐出苏联。托洛茨基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对立，并且提出“发展不平衡原理”，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立。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认为：不断革命，就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就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不能“停留在民主阶段”，而要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并进行反对外部反动势力的战争，意味着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衔接，而且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亡的时候才会结束。

# 关于国内各项政策和国际问题的短篇指示汇编*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国内各项政策和国际形势作出过很多重要指示。这批指示主要以批语的形式出现，一部分是谈话的纪要。这些指示篇幅普遍较短，为了保证选集应有的篇幅，我们将这些小的指示再进行编年排印，成为本篇。

##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1]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 谈学生健康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要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要吃的饱。学得太多，可以少学一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方面要克服忙乱现象。

## 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批语。

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

## 谈妇女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中的一段。

看不起妇女的人虽不多，但哪里总有几个，这不完全怪他们，过去封建制度对他们影响太深了，脑筋一下不容易转过弯来，又不能用飞机大炮来对付他们。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加强教育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妇女同志们做出成绩来，多拿事实给他们看，看得多了，他们脑子里的那个封建王国就会不攻自破的。

## 农、林、牧三业要结合（一九五八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廖鲁言同志《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上加写的话。

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

## 好好研究煤的综合利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的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这是一个好文件[2]，值得一读。请小平[3]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4]！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一九五八年六月）

*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得到了光辉的实现。这个论断提出六年之后，即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九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5]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指示。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很好的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的工业，那有现代化的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6]。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 群众的检举很有作用（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新华社、《人民日报》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时的指示。

文章发表的面比较宽了，目前可以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了。

群众的检举很有作用。这要大大提倡。反革命最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报社有几百封信、有材料，应写成新闻，让读者知道自己的信有了下落。对反革命分子也要进行神经战，使他们知道我们发动了群众。并且进一步号召群众检举，写成社论。

不要把自由主义当作政治上闹独立王国、反党等等。

##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一九五八年）

*这是《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上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中引用的一段毛泽东同志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视察多地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视察徐水、山东、天津等地谈话中的主要部分。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们丰收！秋收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

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怎么样？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的中学勤工俭学搞的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的一段。

目前国际局势很好。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它们的目的是要统治一切可能统治的地方，但是它们到处受到抵抗。它们这些殖民国家结成一体，自称为西方国家。从地理上看，巴西也算西方国家；但是，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说的西方国家，实际上只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荷兰等等。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7]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这句话，杜勒斯[8]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

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拉丁美洲人民起来了，他们不把尼克松、杜勒斯看在眼里。在他们眼里，尼克松、杜勒斯不过是纸老虎。尼克松、杜勒斯都落后了，拉丁美洲人民比他们高明得多。

## 谈游泳（一九五八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1958年9月12日在武汉和游泳运动员的谈话和1958年9月在安徽和游泳运动员的谈话。

你们不要老在游泳池里面练，游泳池小。游来游去就那么一点，要多到江河里去练习。

要走出游泳池。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应该提倡。

## 对两份关于国际问题报告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对宦乡同志《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的批示；本篇二是对《从美国总统竞选看美国的内政》的批示。

一

宦乡[9]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二

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

## 全民皆兵（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所加的一段话。

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了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沃土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

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给陆定一的信。

陆定一[10]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实事求是，不要浮夸（一九五八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针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节录）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的几段。

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

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我们同美国现在这样的状态，对于我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大概是因为我们破破烂烂，客人不想来。他们要等我们建设好了才来。比如说，美国现在年产一亿多吨钢，大概要等到我们年产两亿吨钢的时候才来。那时，我就要跟各位商量商量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更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也可以建造大房子，因为有了更多的钢铁。这个方针，也许你们不赞成。

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农民不剥削别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剥削别人，他们是手工业者或小市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别人。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有反帝要求。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

##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省委书记王延春同志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等材料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同志对王任重同志报送的王延春同志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同志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关于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的开法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写的批语。

一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11]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

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三月三十日）

**二**

这几个文件[12]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

**三**

此件[13]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四**

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14]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 泽 东

四月三日下午六时

## 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湖南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给中央的简报上写的批语。

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

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15]，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下午一时于郑州

##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的主要部分。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16]。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尼赫鲁[17]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 谈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18]。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19]，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20]。我们打金门是内

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21]。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22]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23]，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 谈中印关系（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24]，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25]，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

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上写的批注。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李先念一九五九年七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和改写的两段文字。

一

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二

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七月四日）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七月四日）

##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李云仲同志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

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永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26]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27]，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28]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

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廿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 谈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讲讲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谓人生观就是社会观，世界观，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部分。为了通俗起见，说人生观也可以。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俄国有造神论、神论和迷神论，把精神来造人。是谁呢？是不是芦那察尔斯基、波格达洛夫，他的著作我看过，现在忘记了，马赫主义说，是奥地利和德国的，美国叫实用主义，又叫功利主义，是一个东西。他们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真理是固有的，不是个人主义的真理。由感性到理性，客观真理又变成主观真理。

主观真理是来自客观真理。同宗教不同，和主观唯心主义不同。相反的。我们的这些同志一厢情愿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而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真理，求是者是主观反映客观真理，要经过脑筋。要千百次反复的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人马牛羊、鸡犬猪都是概念；人有资产阶级的人和无产阶级的人。男，女、老、幼都是概念。都是抽象来的。具体的人，张三李四。如董老，林老、吴老，你们是老年人，你们的娃娃是青年人。你们的夫人叫女人。

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巴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

端流派．是最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宗教家，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也没有了。他们是唯我主义。

为什么要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 对张闻天信的批示（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张闻天同志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信的批语。张闻天同志在这封信中称，“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

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毛 泽 东
八月十八日

## 对彭德怀信的批语（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都是有区别的。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

的区别。即便一个集团内部，例如艾森豪威尔[29]集团内部，也不那么简单，也有两面性。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

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如果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30]未能取得成功，条约修改了，那末，十年后这个条约还将提到日本人民的面前，那将会教育日本人民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一般讲，美、英、法同德、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美、英、法有不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要守卫的地方很多，从台湾和南朝鲜到土耳其，都要守。从这一点上说，它们很富。美国没有殖民地，但有很多半殖民地，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和台湾，要保守，要维持现状，以便继续控制下去。西德和日本就不同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殖民地被搞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未搞到殖民地。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全被剥夺了。它们很不甘心，想继续侵占殖民地，但现在受美国的控制，还未准备好。它们想摆脱美国，再搞扩张。这些看法是否对，愿同你们交换意见。

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未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31]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

## 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一九六〇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

斯大林奖金[32]我们没有就不要搞，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勋章、博士那些东西不要搞了。

##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33]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34]，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35]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贻误。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 在上海会议[36]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印发《关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外长会议》、《苏联当前的新动态》、《罗〈阶级斗争〉第五期全文转载苏文章》、《对三篇文章的几点零星反应》这四件材料写的批语。

此四件可看，阅后收回。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

识了客观事物（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并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争，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斗争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没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 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报告的批示（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

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山西省委的报告讲得很对，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情况，那么，所谓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谈。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三个月来，山西省委认真地采取了措施，已经从各个方面压缩一百一十万劳动力同到农业生产战线，农村劳动力情况有很大好转。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领导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的报告，参考山西的经验，从各方面研究，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村缺乏劳动力的严重情况。

##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

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 主观主义害死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转发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关于农村调查来信的批语。

此信[37]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 调查成灾一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戚本禹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语。

如果还是如同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方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赶走。

## 在接见日本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有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 不得人心，武器再强也不免失败（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

中国人民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最前线，进行了英勇斗争，美国很怕你们。美国是那么个大国，可是怕你们这个小国，拿你们没有办法。直接进攻，又怕世

界舆论。还有一条，怕陷进去出不来，是不是啊？

南越游击队规模并不很大，可是美国人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过去几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五千人。美国过去说几个月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期限了。

我们抗美援朝，也有苏联的帮助，苏联卖武器给我们，那时斯大林还在。斯大林就是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前不久逝世的。不过，那时他们是在后面帮助，主要是朝中两国人民和十六国军队打仗，其中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的，等等。

这说明帝国主义强大还是强大，但是可以战胜的。对付帝国主义，你们是有经验的，我们也是有经验的，和美国人、日本人都打过。就是要准备打仗，没有准备就危险。

二

我们革命时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重炮兵。只是在革命过程中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才有了大炮，都是美国供应蒋介石的。缴了些坦克，但没有组织坦克部队。空军始终没有。我们的空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开始建立的，和你们一样。

可是你们的敌人巴蒂斯塔[38]有重炮，有空军，有海军，比你们强，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就是不得人心。那时根本无人援助你们，尽管美国援助巴蒂斯塔，也不免失败。简单的道理，和蒋介石一样，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他，那有什么办法？武器再强也没办法。这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胜利的，布尔什维克手中是没有武器的，是从敌人手里夺取的，是列宁指挥的。

三

联系群众永远不会失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脱离群众，他们总有一天要失败的。

#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月、六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批语和几段经过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

林克[39]：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40]四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

毛 泽 东

四月十七日早上四时

二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三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

**四**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内，甚至几百年内，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六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七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同时，各国共产党人也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

八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那就绝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九

只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十

认为世界两个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一切其他矛盾（即包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和平合作的新世界”。

十一

共产党人在争取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革命左派（在个别国家，则还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间派）的同时，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

## 不靠原子弹、氢弹取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

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41]到中国来了一次，就是为了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

我对他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一万八千公里中国海岸线全部交给你。他说，把海岸线交给我以后你们干什么？我说我们搞游击队嘛！他说搞游击队干什么？我说你把全部海岸线都搞去了，堵住了我的鼻子，我不搞游击队怎么办？第二个办法是全部海岸仍旧归我管，你帮我们搞海军，建立好了也归我们管，全部费用归我们出，战时共同使用。这两个办法由你选择。两个办法他都不赞成。全部归他，觉得不好意思；全部归我们，他又不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过去占领大连、旅顺的办法。过去他们在那里有海军基地，朝鲜战争后他们撤回去了。我说，你们可以再回来。他觉得这也不大好，因为他们撤出大连、旅顺是两国政府发表过声明的，再回来不好。

建立长波电台是他们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侦察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敌情。但是他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苏联出建设费百分之七十五，只许我们出百分之二十五。为这个电台的建设费问题，谈来谈去，谈了不知多少次。我说，建立电台的费用我们一个钱也不要你们出，苏联可以卖电台的器材给我们，电台归我们管，共同使用。这就谈不拢了。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印度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他单独发表了一个声明，名义上是中立，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他们在帮助中国建设工厂的整个时期，总是有一部分最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

这一年他从戴维营回来就来教训我们，那一次也是谈得不欢而散。他受美国总统的委托，一定要我们把七八个美国特务释放。我说一个也不放，要照我们的法律办事。这几个美国人是空中特务，被我们飞机打下来的。美国始终不肯同我们达成任何妥协。我们把大部分美国人都放走，只剩下这几个了，他们是严重的犯罪分子。那个时候，赫鲁晓夫神气得很，因为他带来了戴维营精神。

二

那是一九六〇年，那一年也恰好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我们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给了苏联一些。就在那一年，他们撤退专家，撕毁协定，在我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么一点压力。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们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人，也没有把我们吓倒。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进攻我们，延安也丢了，大一点的城市统统丢光了。但是战争的结局是，美国人跑光了，蒋介石也跑了。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猖狂到要把战争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把美国人赶了回去。

三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但是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怎么能用这种武器打胜帝国主义呢？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至少可以保持一个游击区。我不相信中国会永远是个游击区，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出国境。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同志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本篇四是一九六四年十

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同志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同志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泽东同志在李达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一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二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所以在教育科学中有心理学、教育学这两门科学。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42]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4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一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九月二日稿、九月五日稿和九月十日稿的修改。本篇二至十四是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几段文字。

一

即送康生同志：

同意十三日见报[44]。有一些修改，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一日上午七时

二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三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45]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四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

五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

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六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七

倍倍尔、卢森堡[46]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八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九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十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47]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48]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十一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十二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

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

十三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

十四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为送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本篇二至二十一是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几段文字。

一

退周扬同志：

讲得好，完全同意。

毛　泽　东

十一月八日

二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四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

五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六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七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八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九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

十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十一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十二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十三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49]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十四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

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十五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十六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50]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51]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

十七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十八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十九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

二十

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

二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对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的两个批语。

一

彭真、刘仁[52]同志：

此件[53]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二日

二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 工业部门学解放军（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一封信。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54]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55]和三八作风[56]。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57]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

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修改。

一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 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一九六四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徐冰[58]同志《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组批语和修改。

一

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同意这封信，只在第 7、8、9 页上，作了一点增改[59]。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　泽　东
四月卅日

二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三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 现在的苏联是希特勒式的专政（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 关于保健的一段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外宾时的一段谈话。

中国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我一年不找他，算他的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进。

##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通篇都体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简直就是毛主席著作。在这封公开信中，这几段重要论述集中概括了毛泽东同志六十年代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经过毛泽东同志反复修改。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摘录）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

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一九六四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 在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没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有的，不然就没有正确的了，真理是对谬误而言，唯物论是对唯心论而言，辩证法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一万年以后，形而上学，唯心论还是有的，不然社会上就没有矛盾了，斯大林晚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只是强调苏联社会各阶级人民的一致性，而否认了不一致性。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这是指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实际上隐藏了深刻的矛盾。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肯定变成了否定。当然，否定又变成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苏联人民不可能长期被修正主义统治下去。

## 不能怕麻烦（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

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写的批语。

林彪同志：

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60]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61]等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 注释

[1] 这份《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中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人委布置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突击。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联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了一百个突击队，深入到十七个区三十八个单位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作出了榜样。各个区的卫生运动都开展得有特点、有目标。各办事处均有一个重点户带头示范，树立旗帜，并已决定将每星期四作为除四害日。

[2] 指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为转报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向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部担负的是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很多技术问题我们不懂或者不完全懂，因而苏联专家就成了我们当前的重要技术力量。苏联专家受苏联党和政府的委托，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建设，他们把能够帮助我国建设厂矿，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不明确，在共同设计的时候，有时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因此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形成了两股劲。直到成都会议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才有所转变。近一个多月来，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反复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建设总路线，使苏联专家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效果很好。现在苏联专家

能够和中国同志一起主动地讨论，制出新的更合理的设计。这就使过去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5]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 见《孟子·离娄上》。

[7] 见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7——319 页）。

[8]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9] 宦乡，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

[10]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11]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本卷第五十六篇。

[12] 指王任重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同志的四份材料：王延春同志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志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同志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同志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13] 指王延春同志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14]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召开的部分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

[15]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的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的方针。见本卷第五十七篇《郑州会议纪要》。

[16] 见《聊斋志异·青凤》。

[17]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18]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19] 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20]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

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2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22]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23] 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24]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25] 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西藏人民所渴望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了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

[26]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7]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8]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29] 艾森豪威尔（一八九〇——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30]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〇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

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31] 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32] 斯大林奖金是根据 1939 年 12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设立的一项奖金，旨在鼓励科学技术发明和文学艺术创作。从 1941 年起开始颁发，一年一次。1953 年斯大林逝世，这项奖金随之停止。1966 年 4 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将斯大林奖金改名为苏联国家奖金。

[33] 卫生部党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并转中央的报告说，卫生部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主要目的是推广稷山县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广泛交流全国各地的经验，组织农村卫生工作大跃进。

[34] 卫生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从县到生产队的卫生医疗保健网已初步形成，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关于做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县医院（卫生院）的工作，认真贯彻“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方针，使县医院真正成为全县医疗技术的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

[35]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提出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十七条说：“除四害。从 1956 年开始，分别在 5 年、7 年或者 12 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36] 指 1960 年 1 月 7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7] 指张平化同志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说，从五月二日起，我同一个调查组在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作调查，同时在文家市作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和供销社的试点。大江大队经过整风整社后，“五风”基本上纠正了，但遗留问题还不少。我们认为，大江大队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整风整社之中及其以后，一定要抓紧落实按劳分配的各项积极措施，这样才能纠正平均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从正面引导农民走集体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走单干的老路。

[38]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一九五九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

[39]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

[40]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

[41]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2]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43] 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44]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发表。

[45] 赫鲁晓夫，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6] 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7] 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一年一月起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

[48]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

[49]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鼻祖。

[50]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51]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

学家。

[5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53] 指《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

[54]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55]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56]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57]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58] 徐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59] 即此篇（三）。

[60] 指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中下旬，五十五师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战备和演习中看到，部队贯彻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有：一、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部队接受任务后，思想稳定，斗志旺盛，求战心切，纷纷要求打头阵，当尖兵，对阶级敌人表现了高度的阶级仇恨。二、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接受任务后，部队集结快，零散人员收拢快，思想发动、组织调整、物资发放快。三、对部队的活思想抓得较深较细。抓住有代表性的问题，能较快地弄清事实，耐心说服，加以解决。四、狠抓政策纪律。基本上做到了“部队走到哪里，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把好影响留在哪里”。在备战和演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坚信突出政治的根子还扎得不牢，“转向”的苗头时有出现。二、平时战备思想不够落实，战备形势教育有片面性。三、平时对基层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抓得不紧，领导指挥能力低，办法少。四、政治工作本身还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图形式，走过场，乱提口号，乱要统计数字。

[61] 艾思奇（一九一〇年——一九六六年），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原名李生萱，哲学家。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毛泽东同志称他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十二日）

### 一 一月十一日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1]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2]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3]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4]。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

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5]犯了错误）。

## 二 一月十二日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6]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法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7]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

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些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有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8]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9]，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

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10]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鲁言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 注释

[1] 章伯钧（1895 年 11 月 17 日—1969 年 5 月 17 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今枞阳县后方乡育才村），中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收藏家。

[2] 见本卷《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3] 张奚若（1889 年－1973 年 7 月 18 日），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

常委、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务；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著有《主权论》、《社约论考》等。

[4] 梁漱溟（1893 年 10 月 18 日-1988 年 6 月 23 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十八日的著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对梁漱溟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陈铭枢（1889 年~1965 年），字真如，广东合浦曲樟（今属广西）客家人，民主革命家、北伐将领。从军而信佛。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系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5]朱可夫，即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俄语：Гео 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 нович Жу ков，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著名军事家，战略家，苏联元帅。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赫鲁晓夫在50年代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

[6]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7] 见《孟子•滕文公上》。

[8] 即胡乔木(1912 年 6 月 1 日——1992 年 9 月 28 日)，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9] 应该是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1 页，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10] 廖鲁言（1913 年－1972 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

#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刘建勋、韦国清[1]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注释**

[1] 刘建勋（一九一三——一九八三），河北沧县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一九一三——一九八九），广西东兰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

#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

1、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2、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财政（金融）、劳动（人口）（14）

我跟你们今年至少谈四次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华东四省一市

3、水、肥、土、种、改、虫（病）、机、畜、副、绿、害、病（12）

4、省与省比　县与县比　社与社比

十二月开全国党大会评比，同时开除四害的评比会

5、分配：积累与消费问题

6、普遍推行试验田

7、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8、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9、在整风中每单位以几天工夫工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0、何时交计划？（六月？）省的，地的，县的，社的。

11、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伟大爱国卫生运动。

12、夏季为什么不能种树？

13、省一年开中小型会议四次，几十人的，百多人的，二三百人的，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4、书记、委员大多数人，轮番离开办公室，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到处跑，走马看花，下马看花。

15、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

16、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 1958 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气，十分必要。

政治家，一定要懂一些业务，在农业是试验田，在工业试制产品，两者都用比较法，在同一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企业与企业比，车间与车间比，个人与个人比。

技术方面比，政治方面也要比，看谁领导得更好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17、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古代考据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概念和判断的问题，公式是什么是什么。

例如：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

以上是概念问题。

例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准窘步？

以上，是判断问题。

古代的义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理的问题

以上二学，都属理性认识。

18、抓两头，带中间。一个好的方法。

19、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是一个真理，也是方法。

20、一年检查四次，每季一次。非常会议一次至两次。一种好的方法。中央、省、地三级，都这样做。今年试一试这个方法。

中央、省、地三级的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时间离开办公室，到处跑，走马，下马。

二

这肯定是一个好方法。

今年实行。

少一天也不可以。

开会的方法：材料与观点的统一。

用材料去说明自己的观点（思想，意见）。将两者割断，互不联系，是一个很坏方法，并且不生动，使人头痛。

有材料，无观点，则更坏。

只需要典型性的材料，解剖一个或二三个麻雀就行。一大堆材料，只会使人短命。自己应有丰富的材料，但在会议上只需要拿典型。会议所需要使用的材料，和写大著作（例如资本论）所需要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斗。

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1]，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饶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同少数同志交换意见的方法：

同个别人，同十几人，同二十几人反复交换，多次交换，从而得出比较正确观点、政策。

集体创造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方法。

以一个人为核心

看报纸和研究报纸，看文件和研究文件的方法：

要有区别，研究典型。

学本地话，学普通话，学英文

大学生中右派如何处理，开除 20%，留 80%；根本不开除，30%劳动考察

城市支援乡村党

大会应有县书参加

参观法，好方法之一

展览法

大字报　快报

三

23、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4、从今年起着重抓工业，抓财贸，一年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他们有此要求。

25、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自己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当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一个早晨突如其来拿出成品。要下一些毛毛雨。而不要在几小时内，或几天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量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尽可能减少。要有共同语言，先要有共同的情报知识。

26、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27、学本地话，学普通话。

28、中央和省市两级的主要干部建议在自愿原则上会一国外国文，五年至十年，达到中学程度。

29、学一点文学。

30、学一点文法和逻辑。

31、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32、学一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33、学一点历史和法学。

考虑当教授和当教员的问题。

考虑出刊物的问题。

34、干部和秘书的统一，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和二排议员。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

35、中央一级、省一级的若干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36、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37、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

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少奇同志的一条[2]

38、是否要事事问过第一书记？

39、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成过程，思想的形成过程，人脑反映客观世界是不容易的。有了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

40、如何传达？只是建议，需要发展，在四月党大会以前形成正式条文，准备在以后随时修改。

41、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

**注释**

[1] 毛泽东同志讲话中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

[2] 指刘少奇在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时写的关于规章制度的一条，后来毛泽东同志将它收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 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金日成首相同志：

1957 年 12 月 16 日和 25 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

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 12 月 16 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1、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2、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3、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4、今年二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 1958 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1]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5、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1958 年 3 月至 4 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

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1958 年 7 月至 9 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1958 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6、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两瑞[2]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

敬礼

毛　泽　东

1958 年 1 月 24 日

**注释**

[1] 李承晚，当时是南朝鲜政府总统。

[2] 指瑞典、瑞士。

#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次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瓩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瓩），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

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1]，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2]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3]。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嘛，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

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

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地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 12，500 公里，乘 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4]来了吗？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

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5]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采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

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同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6]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7]。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采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它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注释**

[1] 禹，姓姒，名文命（也有禹便是名的说法），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陶侃（259 年－334 年 7 月 30 日），字士行（一作士衡）。本为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后徙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西）。东晋时期名将。《晋书·陶侃传》：“（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2] 陈铭枢，见本卷《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3] 少正卯（?～前 496），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少正是官职，卯是名。他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卯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前 496 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 7 日就把少正卯以“君

子之诛”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曝尸三日。孔丘说少正卯的五条罪状是：“心达而险”（通晓古今之变，敢于革命）；“行辟而坚”（违背周“礼”，坚持革新道路）；“言伪而辩”（透彻讲述革新道理），“记丑而博”（深知奴隶制腐朽和不稳）；“顺非而泽”（顺着非正统甚至违背道德之引导思想如同江河泛滥般散播四方），诬他“乱政”。

[4] 费孝通（1910 年 11 月 2 日-2005 年 4 月 24 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7 年 3 月 24 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划为“右派”。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

[5] 罗隆基（1896 年 8 月 14 日～1965 年 12 月 7 日），字努生，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二号右派，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右派之一。

[6] 《四进士》是京剧传统剧目。也在秦腔，豫剧，越剧，湘剧中普遍传唱。故事梗概是：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四人出京为官，当时严嵩专权，同仇敌忾。相约饮酒中，相互勉励，赴任后不违法渎职，以报海瑞举荐之功德。当时河南上蔡县姚廷春的妻子田氏图谋财产，毒死丈夫的弟弟姚廷美，又串通弟媳杨素贞之兄杨青，又把杨素贞转卖给布商杨春为妻。杨春听素贞哭诉，撕毁身契，代她告状。正遇毛朋私访，代写状纸，嘱去信阳州申诉。杨素贞与杨春失散，遇到恶棍，被革职的书吏宋世杰所救，认为义女，携至州衙告状。田氏逼她的弟弟巡按田伦代通关节。田给信阳知州顾读写了求情信并送上三百两贿赂的白银。田的下书差役，恰好投宿在宋士杰店中，宋偷看信文，发现与义女杨素贞事有关。顾读读到书信后，徇情释放了被告，押禁了杨素贞时，宋上堂质问，却被杖责后轰出堂来。遇到田春，杨春又叫去巡按毛朋处上告，毛朋接状，宋士杰作证，田、顾、刘均以违法失职问罪，判田氏夫妇死罪，为素贞申明冤情。

[7] 杨振宁（1922 年-），安徽合肥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1957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1]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剂，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

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文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

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

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

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

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

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2]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 * *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注释**

[1] 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三条。

[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修改

（一九五八年二月）

*这几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

一时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的风正在向右刮。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着慌了，想用简单粗暴的压服方法镇压这股歪风。当然教条主义和压服方法是克服不了修正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害怕鸣放，是由于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所以他们表面上的“左”正是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右”。

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让他们鸣放的方针，因为他们力争鸣放，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党早就公开说明，我们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锄翻，变成肥料；我们不怕牛鬼蛇神，要请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我们看到毒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党相信群众有识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两军对垒。两方面都高兴。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

在我国，1957 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就体现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阶级消灭以后则体现为新旧斗争。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密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

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变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

#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

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 一 三月九日的讲话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少奇[1]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

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 14 项。商业是否也搞 14 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 150 斤，1956 年一跃为 800 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工作方法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 23 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2]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陈云[3]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

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 二 三月十日的讲话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4]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5]。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

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6]独裁，还是沙文汉[7]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

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8]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9]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 三 三月二十日的讲话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

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10]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

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

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

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 四 三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

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邓子恢[11]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苏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着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

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琪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12]。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13]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

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一一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14]十八、十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15]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 五 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郝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商。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

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战术[16]，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17]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18]）。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 六 三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

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

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 七 插话（一）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 八 插话（二）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 九 插话（三）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

来个专题鸣放。

## 十 插话（四）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 十一 插话（五）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震林[19]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 十二 插话（六）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做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

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 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曰所有制，一曰相互关系，一曰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 十三 插话（七）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20]。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

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21]，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22]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 十四 插话（八）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23]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上并非真左派。

## 十五 插话（九）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马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 注释

[1] 少奇即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宦乡，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

[3]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4]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5] 米夫（一九〇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〇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6] 江华（1920 年-2006 年 8 月 31 日），江苏省灌南县新安镇人。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原常委。1940 年 9 月参加革命。1941 年 7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苏北淮海区潮河大队大队长，江苏省阜宁县委敌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保卫部部长，华中五地委社会部侦察科长，苏北区党委社会部保卫科长，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侦察科科长，政保处副处长、处长，江苏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三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等职务。

[7] 沙文汉（1908 年-1964 年），浙江宁波人。1925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 12 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1957 年被划为右派。

[8] 《布尔什维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9] 《实话》，由中共中央出版，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第十三期。

[10] 李井泉（1909 年 11 月 1 日—1989 年 4 月 24 日），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1] 邓子恢（1896 年-1972 年)，又名绍箕，福建龙岩新罗区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2] 分别见《孟子·滕文公下》、《汉书·叙传上·答宾戏》。这几句话的原文分别是：“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13] 比干，子姓，比氏，名干，沬邑（今河南淇县）人。商代帝王文丁的次子，帝乙的弟弟，帝辛（商纣王）的叔叔。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劝谏，被称为“亘古忠臣”。公元前 1063 年，被纣王残杀，终年 63 岁。 屈原（约公元前 340 或 339 年—公元前 278 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朱云，生卒年不详，字游，原居鲁地，后移居平陵，少好任侠，年四十，学《易》、《论语》，元帝时，与少府五鹿充宗辩论易学，获胜，遂授博士，迁任杜陵令，后为槐里令。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廷大臣。汉成帝时，朱云进谏攻击丞相张禹为佞臣，帝怒，欲斩之，他死抱殿槛，结果殿槛被折断。后以左将军辛庆忌死争，遂获赦，皇帝亦下令不换断槛，留下“折槛”的典故，但朱云自此不复仕，晚年教授生徒，年 70 余卒于家。 贾谊（前 200—前 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少有才名，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

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 33 岁。

[14] 邹容（1885 年—1905 年），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原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出生在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因思想倾向维新，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始撰《革命军》初稿。

[15] 章太炎（1869 年 1 月 12 日—1936 年 6 月 14 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为了驳斥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这篇长文中，章太炎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章太炎首先列举了满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清朝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满汉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他称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即使光绪在西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 1903 年以前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同时它又吹响了鼓舞革命志士继续前进的号角，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影响作用。

[16] 即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

[17] 张清荣（张春生），河北保定市人。1938 年在河北省清苑参加八路军。1945 年任副营长，1946 年任营长，1950 年任炮兵师团长。曾于 1952 年 2 月参加抗美援朝。1954 年任炮兵师副师长，1957 年 8 月调任福州军区高炮第 63 师副师长。1957 年 12 月 17 日晨乘渔船叛逃至金门，被台湾当局授予炮兵上校军衔，他本人也改名字为张春生。1958 年 10 月被台湾当局逮捕，同年 12 月被枪决。

[18] 基诺夫，即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俄语：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20年代—30年代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34年2月起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书记和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敌人暗杀，葬于莫斯科红场。 高尔基，即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别什可夫，前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1921年10月出国疗养。1928年回到苏联，在斯大林的安排下，在俄罗斯作了两次长途旅行观光后决定回国定居。1934年当选为作协主席。回国后的高尔基作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为苏维埃的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代表作品有《海燕》、《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19] 谭震林（1902 年 4 月 24 日—1983 年 9 月 30 日），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0] 鱼鳞坑和下文中的“葡萄串、满天星”，都是群众治理水土流失、蓄水用水的经验、创造。鱼鳞坑是指为减少水土流失，在山坡上挖掘有一定蓄水容量、交错排列、类似鱼鳞状的半圆型或月牙型土坑。葡萄串、满天星，即按照沟壑的走向，自上而下，梯级开发，修筑许许多多纵横相连的小型蓄水库、蓄水池。

[21] 蓄、小、群，即“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与之对立的是“排、

大、国”。

[22] 曾希圣(1904 年~1968 年)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23] 邓初民（1889-1981），又名邓昌权、邓希禹，男，汉族，中共党员。著名社会科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山西大学校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山西省体委主任，省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 一批按语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写的说明。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这些按语[1]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2]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注释**

[1]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写的一部分按语，这些按语多数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5-259 页）。

[2] 书名应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九五六年一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插话

（一九五八年四月）

一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的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

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的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花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 二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公方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扳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

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 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蓬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

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 三 插话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付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此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

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担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阴。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时，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没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的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大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这是党内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 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1]，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 年 4 月 15 日，于广州

**注释**

[1] 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个报告同本篇一起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

[2] 这段话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同志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同志批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 临时通信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信。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各省委、宜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

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 1962 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1957 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 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连夜赶工，有七天至十天时间也就够了。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底子，赶一下不甚难吧。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春再做更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此件用电话通知。

毛　泽　东

1958 年 4 月 23 日

#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

## 一 五月八日的讲话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

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〇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

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

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1]，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 二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那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那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那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2]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3]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的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刘少奇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刘少奇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刘少奇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那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

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震林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往人代去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

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入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

要向先进看齐。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旱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

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4]。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采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起可能再要七年。有人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

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5]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于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谈话，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

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有人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

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6]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没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7]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8]（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有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 三 五月二十日的讲话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 7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

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小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娄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数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举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火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

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吴芝圃、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9]……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

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复生[10]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周扬[11]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12]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旗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悬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游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 四 五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

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

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12]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萍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注释**

[1] 范文澜（1893 年 11 月 15 日—1969 年 7 月 29 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原大学等校任教。1958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范文澜同志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2] 周佛海（1897 年 5 月 29 日-1948 年 2 月 28 日），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3] 陈公博（1892 年 10 月 19 日－1946 年 6 月 3 日），广东南海人，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南海。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第二号大汉奸。

[4] 见《礼记·杂记下》，原文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

[5] 李世农（1911 年—2006 年），河北巨鹿人，1930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皖中

工委书记，中共皖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中共蚌埠市委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兼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1951 年至 1958 年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1958 年被定为“右派分子”。

[6] 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7] 罗章龙（1896 年 11 月 30 日—1995 年 2 月 3 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因反对王明，他组织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分裂党，被开除党籍。 张国焘（1897 年－1979 年），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5 年 4 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 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 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 年 6 月被迫取消。1937 年 3 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 年 4 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 月 18 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8] 冯白驹（1903 年—1973 年），海南省琼山市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师长，广东省人民抗日纵队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暨 43 军政治委员，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等职。

[9] 丁玲（1904 年 10 月 12 日-1986 年 3 月 4 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55 年和 1957 年，丁玲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现今汤原农场、宝泉岭农场）劳动 12 年。 李峰（1919 年 11 月-1995 年 11 月），山东邹平县人， 1938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 11 月底在帮助省委整风的干部大会上，因不同意省委农村工作的某些意见，受到批判，1958 年 3 月，被撤销党内职务。古大存（1897 年—1966 年），广东省五华县人，早年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后，古大存被打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 陈再励（1887 年～1975 年），湖南省平江县思村乡人；1926 年加入中共，建国后担任湖南省委委员、省民政厅厅长、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广西省副省长等职；1958 年被划为右派调回湖南，任湖南农学院顾问。 吴芝圃（1906 年 3 月-1967 年 10 月 19 日），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孙作宾（1908 年—2002 年），陕西西安人，1927 年 2 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革命工作，1929 年 6 月加入共产党。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任青海省图书馆馆长。 沙文汉，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7]。

[10] 潘复生(1908 年—1980 年) ，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山东文登县人。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外，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吴芝圃违背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中对潘复生同志的定性，对潘的批判愈演愈烈。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吴任第一书记，潘被免职。

[11] 周扬（1908 年~1989 年），原名周运宜，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2] 章伯钧，见本卷《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 罗隆基，见本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章乃器（1897 年-1977 年），浙江青田人，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1957 年被划为右派。

# 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洛甫[1]同志：

三个报告[2]都看了，第三个[3]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注释**

[1] 张闻天，又名洛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2] 指张闻天同志一九五八年四月中下旬给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并报毛泽东同志的三个报告，分别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局长齐维礼同志谈对外贸易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外商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

[3] 指张闻天同志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给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并报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

# 毒草是要锄掉的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上加写和改写的几段文字。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英、法三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了，虽然它们现在仍然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反共、反人民、反民族独立运动为目标而互相联系着。

曾经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表示怀疑的同志，许多人已经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同你们算帐。"让他们等着算帐吧，他们总是要输的。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毒草既然是客观存在，不让他们以本来面目生长，它们也会以各种变形面目生长，暗里地毒害人群。不如公开对它们说：毒草是不合法的，长出来是要锄掉的，但是我们并不禁止你们长出来，有谁愿意出来斗争就出来吧。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未被锄的仍然起来斗争，并不因为前车之覆，后车就警戒了。凡未被锄的，今后一有机会，必然又会起来，那时又得再锄。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

#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付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住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个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1]，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 7 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 7 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敌、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注释**

[1] 潘复生，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0]。古大存，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9]。 冯白驹，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8]。

#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写的批语。

此件[1]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释**

[1]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 150 台，一九五九年生产 1500 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

#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

## 一 六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这次讲话不是指示。先讲几点意见供参考，是否对，供讨论。只当做问题提出，几年来习惯于这种形式，你们什么时候起来的？今天？我是昨天起来的。大家比我高明。经常接触实际。对军事没有抓。这几年，有同志批评了军队。但他也有责任，我有点单打一，这方式曾提倡过，但有时也有缺点。军事工作基本上作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也怪我去抓别的了，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头一页上讲："不唱天来不唱地，开头先唱香山记"。事情总是这样的。我这几天，不唱天，不唱地，开始先唱别的戏。这事也难免，唱《打渔杀家》不能同时唱《西厢记》，如红线女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据说有二百个，其他的时间不搞工作。虽有理由。但也不大好，有个空军政委说，他这次参加会议很荣幸，沾一点边，是否中央间接有点责任，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这是提出了问题。这次检查首先检查军委和各部。不要针对各军区，他们可以同去检查。你们越压迫我，我越舒服，中国人不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起来革命。人不逼不革命。帝国主义压迫劳动人民，实际作了自己掘墓人。当然你们的压迫不是帝国主义的. 是督促的意思，否则我们不会动了。事情关系到六亿人民，关系到世界持久和平问题。

军委几年来工作基本对的，但有很大缺点，责任首先在领导。

国内形势起了很多变化，几亿人民起来奋斗，这次会议批发了富春、先念、薄一波、冶金部、一机部几个文件，希望大家很好地阅读（主要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值得仔细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一曰粮，二曰钢，三曰机械。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二曰钢，今年计划：五年之内争取六千万吨，要接近苏联（七千万吨）明年可能超过英国。从工业方面想办法，干部一年下去四次，抓四次。军队也如此，你们要我管少了，是要我多抓，驴驹子喜欢人骑，中央这些驴驹子也要有人骑。如果没有钢，不能造机械，炼钢本身也要机械（平炉、轧钢等）的发展，电力、石油、炼油、采矿都需要机械，还有交通运输机械（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农业也要机械（拖拉机、排灌机械等）。

当前是粮、钢、机械三个重要问题。

军委会开的很长，但还要准备很长的开，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最少一个半月。反正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六十条中有一条抓军事，同样每年要搞几次军事，过去中央抓得不够，现在愿意抓了。现在各方面进步很快，首先是地方，特别是农业方面。这是说中央各部门是有缺点的，多了一点东西，少了一点东西，多了一点官气，少了一点政治。南宁、成都会议，八届二次会议后，政治扩大会议后，有很大进步，不能说他们"一多二少"了。官气少了，政治多了。军队有的同志讲，工、农、兵、学、商，兵在老三，现在落后了，如果有些落后，是领导上有缺点，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开的很少，这几年主要抓农业，搞出一套办法。解决了，以后搞工商也都弄出来了一套，还有一"兵"和学都往那里开会（康生：前几天主席讲：工农兵学商，农搞出一套思想解放了，工业也基本上搞出一套，

商（财贸）也如此，只是兵与学未搞出一套来，意即“兵”“学”落后、思想落后。）开始动了。（康生：前几天主席的话有道理，教育的确还未搞出一套中国形式的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民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大众的——走群众路线的。教育与广大群众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留同志们三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何迷信？思想没解放？这次会议务实太多，务虚不够，讨论中的时间不够，也可以看出这问题。大跃进中，群众思想跃进，教育工作跃进，我们领导思想仍落后。我们这会有点事务主义，（他们的会还要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这两方面都在开会。军队的落后，不是全部落后，中间脱节，可能上层热情少点，但也不是上层都如此，军事干部对我说：“各方面是大跃进，军事进步不够，心不安。”这是好的，经过这次会议后，会起变化的，军事会议要开得好，要讲清道理，达到一个目的。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五千万，地方比苏联小一半，但是比较好是温带，海岸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国家有山有平原，山是西边，平原在东边，这有好处，使水位落差比较多，可建水坝利用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苏联早一些，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已有四十七年；俄国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时间很短，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有三十八年，我们落后，但革命是自己搞成的，自己找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是一种辩证主义的原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作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什么？在莫斯科会议前，我们有五条，后变成九条，这种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结合不行，因中国有其历史的特点，照搬不行，有过照搬，党的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但也有很多好处，给了我们教育，得了很多经验，同样的，凡是我们的敌人也给我们很多教育，也有好处。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等，再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1]，有些是党内性质的，王明现仍在党内，但他走到何处？将来再看，这人一开会就有病就是了。政治上犯错误，军事上也一定会犯错误。写过游击战争小册子，古田会议决议案是总结那时经验，划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军事的界限，那时这种界限不清楚，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军队中有两种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军事学，一套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很有兴趣，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外行指当时军代表政委不能领导军队，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当然不存。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军队非学过军事不可，你们大家是否进过学校，没有的。这不是说过去在军队呆过的同志没用，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革命要迟好几年，俘虏兵也有作用。过去内战中俘虏兵也是内行。

如果是缺点，大家都有，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有那么一股空气，对资产阶级军事学特别有兴趣。林彪虽进过旧学校，但他反对那一套，另搞了新花样。实际上资产阶级军事管理制度无非是打骂制度。这一时期，喜欢旧的资产阶级军事学，管理制度那一套是一种什么思想？可叫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后来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时代，有个外国人（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争思想，说是“上山主义”，他们要正规化，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此时旧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归降洋教条主义，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实际也不是归降，而是两种教条主义合作，结果把我们的工作送掉了，来了个大游击，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穿过地球的中心。其他根据地也犯过错误，中央苏区还来了一个大扭秧歌，一直到陕北。

我们党有三次“左”路线，两次右倾路线，结果军队搞少了，受损失。但也

有好处，取得经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会议，延安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把绝大多数同志说服过来，纠正过来。因此，不能说军事没犯过错误，正因为犯过错娱，蒋介石请我们走，我们就走了。长征中还有一些，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反中央。以后转入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犯过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若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今天没办法在此怀仁堂开会和看梅兰芳的戏。

抗战后，解放战争中全党全军没有基本分歧。一九三八年六中扩大全会上讲述游击战争的好处，可建党建军建政，由九十万游击队变成四个野战军，主要说抗战，解放战争不是按洋教条，也不是按资产阶级教条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当然也参照外国经验，不是按着两种教条主义取得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胜利后，我们又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小战争。苏联同志讲过，在朝鲜战场上，敌空军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未遇到过，当时我空军不能到第一线（敌后）。第二线（三八线）只能在后方顶一下，在当时情况下，打败美帝国主义很不容易。有人说我没参加世界大战，不对，我们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美国陆军怎么样？不清楚，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在战略上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但是在战役和战术上要看成是铁老虎。

胜利后办了许多学校，产生了教条主义，请那么多苏联专家来，教条主义自然有了。到底有教条主义没有？对此有四种看法：（1）没有；（2）有，不多；（3）有，不少；（4）有，很多。那种对请大家讨论。

党的历史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一种是无产阶级接受外国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对这两种都作过斗争，克服过。

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是否有？我看有点，分量问题可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没有。只写过几篇文章，那时有一肚子气，没有气也写不出来。王明由苏联回来，速胜论，写文章说抗战四年胜利。当时有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党内主要批评速胜论，对国民党则主要批评亡国论。那是应时文章。现在的一套我不懂了，小米加步枪，我是看过的，辛亥革命时也背过。后来南、北议和，成了外行。

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次会议要作点决定，大的一个，小的可几十个，成都会议就是这样（三十多个）。实事求是讲道理，大家说，大家要讲心里话，我们也提倡直道心事（坦白、交心）。直道工作，有人怕讲了穿小鞋，穿有什么要紧？共产党怕穿小鞋？中国过去女人都穿小鞋。三寸金莲不妨碍她们生四万万五千万人，共产党人怕什么？穿上几十双有何要紧？我在成都会议讲过五条，杀头当然不会，我们提倡交心，我向你们交心，得罪人有的，总之要插旗子，不插红的就插白的或灰的，不要讲出话来过多斟酌，讲话可以，今天讲话也是乱吹，写出稿子就困难了。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全军团结，要团结起来，必须把问题搞清楚，否则不会真正团结，军人要爽快，交心才能达到团结。

为何要团结？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照二十一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现在蒋介石台湾很小，但还神气，常搞出飞机来。如果我有一亿五千万吨钢，那时只要吹口气，他就要走

路了，现在打雷他不理，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许有可能。

部队一年要开一次会。心里有一个方向，不要糊里糊涂，对肖劲光[2]要讲明白，海军重要，但现在还不行，可是大有希望。明年可能搞到两千五百吨钢，事情也难说。谁想一亩麦子产四千五百斤，粮食今年可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斤，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一千三百也不反对。总之，国家强大，军队也必然强大，有七年可能接近美国，十年超过美国，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为此而奋斗。

## 二 六月二十三日插话纪要

一、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是没有，一种说是有，一种说是很多，一种说是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

三、现在形势很好，特别是国内形势很好。现在我们要抓三样东西，粮食，钢、机械。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到那时候，肖劲光同志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主要的，新的还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四、肯定讲我们要学习苏联，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过去学了，现在要学，将来也还要学。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所以对苏联的经验要有选择地学。苏联顾问、专家，大多数是忠心耿耿的，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肯定。我们对他们应当做兄弟一样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做客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个别的，也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们就是有一个缺点：政治水平不高。有问题时要好好同他们研究，商量问题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团结诚恳对待他们，也要有批评，有斗争。这一方面第二机械工业部做得很好，向专家宣传我们的总路线，专家也说要向我们学习，批评我们有些人有依赖思想。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整。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搞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六、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方法就是一年去摸四次，像地方一样，有系统地去摸。住北京的人，官气多一些，政治少一些（现在有改进），因此要注意这个问题。军委领导要改进，下面有批评，我看这些是好的，要求高一些，都是为了改进军委领导。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加强，如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者，军委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你们不是说文件看不到吗？这次给你们多看一些。你们参加省委没有？（刘培基答：我们有八个人参加福建省委。）福建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知道的。

七、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八、王明至今还向苏联告状，告我三个东西：一是反对共产国际；二是搞个人崇拜；三是强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都做检讨。有人说：共产国际有错误为什么不能反？他说得很对。

九、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由于没有经验，加上教条主义地照搬，浪费了一半，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而没有做到。好处是取得了经验教训。

### 三 六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很好。张宗逊[3]同志的发言很好，我赞成。这是经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逼他写出来的，可见一逼就写出好东西了。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很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亚楼[4]同志的发言也可以。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文章中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

我军队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古田会议斗了一下，但没有说服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线。肖克同志不仅有教条主义，而是个军阀主义，有资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思想。

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做教条来背，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章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请问当时苏联又依靠谁来援助呢？

工农业大跃进，打破了迷信。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形成工业大跃进。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也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同志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

有同志为什么革命胜利后没有搞好呢？除了对前一段未深刻检讨，接受历史教训不够外，一是迷信旧的东西、旧教条，二是迷信洋教条，迷信苏联，三是迷信自己。这个人工作很积极，很努力负责，就是方向不对头，政治上不够强。这

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放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出名字嘛！

有同志主要是迷信洋人，有自卑，没有打破迷信，不以自己为主。现在一个合作社也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然就会落后。湖北省新洲五个合作社搞得较好，麻城差点，可是新洲没有注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而麻城派人到新洲学习，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推广，结果麻城工作跑到前面去了。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边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苏联打败过十四个帝国主义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林总插话：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的情况的。再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对苏军的经验是要学习的。装备技术天天在发展变化，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过去俄国人很怕拿破仑，因为他领兵曾打到莫斯科，最后俄国人又把他打败了，所以俄国人经常宣传他们比拿破仑还厉害。目前苏军顾问搞的东西（作战计划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的，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总结。至于他们说我们是经验主义，那么，我们就说，你们搬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也是经验主义。

肖克[5]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来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关于学习苏联，对内讲“批判地学”，为了不引起误会，对外还是讲“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这一点要向苏联同志讲清楚。学习苏联，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要学，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同他们讲，我们学习你们，你们又是学那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苏联专家现在也有了转变，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朱可夫事件后有转变。（陈毅插话：据归国苏联同志他们也讲：来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经验来的，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你们的经验回去的。）这就说明了大跃进的形势，不但鼓舞了我们中国人民，同时也鼓舞了苏联同志。（林彪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主席曾说我们写的社论比真理报的社论水平高。关于上层建筑问题。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他们的战术，思想性，群众观点有问题。半学，就是学海陆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技术科学，现代化战争组织要学，但也要用我们的群众路线的办法来学。要趁我们这班人还没有死之前。组织一批干部很好地把我们的一套搞出来，传授下去。）这样好。

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是有些东西的。凯风[6]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列主义，我问他看了没有，他答不上。可见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的。（林插话：《孙子兵法》是有唯物论，有辩证法，《孙子兵法》是部集体创作的书，有孙子、孙膑、曹操、杜预等人。）

破除迷信是成都会议提出的，四个月来发展很快，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在全国全面开展，如鞍山，他们也搞大中小型结合，土办法洋办法结合。有了钢，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林插话：民兵很重要。）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粮、钢，机械少，现在搞出了东西给大家看看。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插话：几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

我准备下次座谈会上、专门讲部队整编和干部等问题。

**注释**

[1] 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7]。

[2] 肖劲光，即萧劲光（1903 年 1 月 4 日—1989 年 3 月 29 日），湖南长沙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师党代表、特区军委参谋长、军区参谋长、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军团政委、军政委、军区司令员、军团政委、 军团参谋长、军事部部长、司令部参谋长、兵团司令员、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3] 张宗逊（1908 年-1998 年），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红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八路军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4] 亚楼，即刘亚楼（1910 年 4 月 8 日—1965 年 5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人。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支队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师长、纵队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四野兵团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5] 萧克（1907 年 7 月 14 日—2008 年 10 月 24 日），原名武毅，字子敬。乳名克忠，湖南嘉禾泮头小街田村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 年 11 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1958 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同志受到批判，并被解除职务。

[6] 凯丰（1906 年－1955 年），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凯丰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凯丰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务。

# 介绍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信的批语。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1]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 300 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 200 斤增长 50％，何况还有 350～400 斤的希望。原先的 800 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注释**

[1] 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 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1]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九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一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一百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刚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跟我说，摩洛哥向法国、英国买机器买不到，法国、英国不肯把工作母机卖给他们，摩洛哥要向中国买机器，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机器。法国、英国、比利时离摩洛哥很近，但是不卖机器给他们。我们卖机器给他们。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中国解放后自己发展工业，自己制造机器。你们那些国家怎么样?有没有民族资本?自己能不能制造机器?

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

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2]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注释**

[1] 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全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2] 见列宁《论策略书》。原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

#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1]。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 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

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注释**

[1]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2]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3] 租让制，是苏俄政府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讲到租让制时说：“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5、506 页）

[4] 一九五〇年三月和一九五一年七月，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签订有关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四个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这四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前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

联股份出售给中国。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三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5]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 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〇），前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九四五年创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三年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决议说："以前用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过去五六个月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7] 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十月革命前夕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六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8] 米高扬（一八九五——一九七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9] 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一　，　　，一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库四宁（一八八一一——一九六四），一九五七年时住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一九〇二——一九八二），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11] 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召开。

[12] 《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九条共同的规律，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13]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五条。

[14] 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〇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

[15]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右倾错误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16]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17] 莫洛托夫（一八九〇——一九八六），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 科瓦廖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曾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是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19] 费德林，一九一二年生，苏联汉学家。长期在苏联外交部门担任中文翻译，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20]彼得罗舍夫斯基，曾受苏联政府派遣在中国任军事总顾问。

[21] 叶飞（一九一四——一九九九），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合办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

[23] 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4]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北南两方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迫使它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 把握打金门的时机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的信。

德怀、克诚[1]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2]，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　泽　东

七月廿七日上午十时

**注释**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2] 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 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修改

（一九五八年八月）

*这几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加写或改写的。

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从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是教育的质的飞跃，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

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第五，这是最重要的，我国是一个严肃地进行整风、反右的国家，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国家。我们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

我们也认真研究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 同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

**赫鲁晓夫**[1]：在苏联按总产量来说，钢还比铁多些，因为我们还用废钢炼钢。

**毛泽东**：中国现在没有用废钢炼钢，因为我们还没有废钢。

**赫鲁晓夫**：中国还没有那么多机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在工业化初期会生产更多的生铁，然后才会有更多的钢。

**毛泽东**：今天可以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 3 个集团包围着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西方人宣传是防御性的，我们宣传是进攻的。我看，两种宣传都是对的，是符合双方的需要的。他们不好宣传是进攻的，我们也不好说是防御的，实际上该如何评价？我记得，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就像生过肺病的人一样，在生病的地方长了疤，在周围形成了钙化组织，防止细菌渗入别处。我看，这些组织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灭亡，从而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有时，他们是进攻的，譬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要不是我们反击的话，他们都可能把军队开进匈牙利了，然后再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展开斗争，都可能会引发大的震动。谈到进攻，我指的是在对他们有利时机，给了他们思考的机会，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不消灭我们。这样有利的时机，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后来他们做事更现实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苏联和中国搞反革命活动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匈牙利事件[2]是个教训，我们能使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政权更巩固，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是为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你曾经说过“钙化”是不稳固的，在任何时候共产主义“细菌”是会渗入的。你记得这些话吧？

**赫鲁晓夫**：我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你说得对。他们的组织是不牢固的，这次中东事件证明了在他们的阵营中缺乏团结。

**赫鲁晓夫**：这次在巴格达的街上砍下了国王费萨尔的头，美国人向土耳其和伊朗说：“如果你们这里也发生伊拉克事件的话，我们来帮忙。”这就是说，在国王的头被砍下来以后才去帮忙。我认为，这种帮助是软弱无力的。马尼拉条约是个软弱的组织。它的情况就像巴格达条约一样，这个条约的背后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北非国家。

**毛泽东**：换句话说，巴格达条约夹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更何况墙角本身也不巩固。其主干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东面是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那里的情况也很不牢固。

**赫鲁晓夫**：譬如在泰国，就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他们的国会反对外国在泰国建设军事基地，这很明显，甚至菲律宾也不巩固。

**毛泽东**：是的。马尼拉副市长现在就在中国。感觉他怕打仗，他说，国内有很多军事基地，打起仗来就是个死。他试探我们的想法。这个人是菲律宾总统派来的，美国人想从中破坏，没有成功。他问我们能否卖机器给菲律宾，看来，美国人不会卖机器给菲律宾。都知道，甚至菲律宾国会中反对党领袖也要访问中国。

**陈毅：**美国未必能完全控制住菲律宾。

**毛泽东：**泰国这边也希望不大，这面墙也不牢靠。这种不牢靠在于两面受敌：一面是中国，一面是印度、缅甸、锡兰。他们的 3 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至于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的情况，也是两面受敌，而且都是强大的敌人。这首先是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还有一个第四泛美同盟，但是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过去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得不是太明确。有时我们在强调民族独立运动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我们把三者一起提。我的观点是，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

美国和加拿大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彼此闹矛盾。美、加的情况，你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希腊只是在形式上加入了北约，它与土耳其、英国都有矛盾。

**毛泽东：**正如所报道的，最近几天在塞浦路斯有几千人被捕。

**赫鲁晓夫：**为争这个岛，正在进行一场争执，希腊要塞浦路斯岛，土耳其则主张在土、英之间瓜分，所以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很高。在伊朗，有一个反对派的民主政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积极。

美国是这些侵略性条约的组织者，它强使条约的参加国维持巨额的军事开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害。美国的援助都是军事援助。它每援助 1 个美元，受援国就要付出 5 个美元。美国根本不给这些国家什么经济援助的。如果援助的话，也只是一些粮食和日用品。

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怕这些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与它竞争。甚至在北约各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受到了强大的抵抗。这些国家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联系，反对禁运。

今年上半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震动了西方。我认为，在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整个东方起作用。

**毛泽东：**是的，这是共产主义细菌的渗入。

**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装甲可以防止这种渗入。

**赫鲁晓夫：**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很好，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局势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被抛在后面了。

**毛泽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定 12 年完成，现在看起来，5 年就可以完成。已经过去 2 年半了。我们想，我们甚至可以超额完成。我们的钢铁方面如果今年不能，明年就一定能够超过英国。尽管我们公开说是，在 15 年内赶超英国。煤今年已经超过英国了。钢去年是 500 多万吨，今年要搞 1100 万吨，明年 2500 万-3000 万吨。英国明年的钢产量可能下降，最多也就是 2200 多万吨。如果不发生下降的因素，明年我们搞 2500 万吨，可以超过英国。

**赫鲁晓夫：**这是令人振奋的成果。应该说，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高速度，而你们做的那些，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自己的规划，这对于你们的邻居而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我们经常做比较。社会主义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建设，或者是慢速或者是快速。我们认为，我们所拟定的速度是比较好的，并且是能够实现的。

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是钢，一个是粮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是社会主义。一种方法是：少、慢、差。另一种方法是：多、快、好。采用哪种方法来发展？我们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并作为一场战斗，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来完成这个计划。人民满怀热情，并为提前完成这个计划而顽强斗争。

粮食问题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我们提出了从今年开始“进行三年艰苦奋斗”的口号。届时，人均粮食将达到 1000-1500 公斤。这些数据我们暂时不想公布。

**赫鲁晓夫**：是人均 1-1.5 吨吗？这可是很多呀！

**毛泽东**：在报纸上我们说，在 3-5 年我们将达到 1 吨或大约 1 吨粮食。实际上我们将用 3 年时间超过 1 吨。可以做得时间又长又慢，也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

**赫鲁晓夫**：我在德国已经说过了，美国是不会给我们援助的，铁托却大有希望得到援助。

**毛泽东**：讲得很好，很满意。总的来说，是发展自己，破坏敌人。在东方还有一个地区，它在形式上没有加入集团。这与费德林有关系。涉及日本、台湾和南朝鲜。

**周恩来**：还有南越。

**毛泽东**：有这种可能，这些国家也许会组成一个东北亚军事集团。他们被绑在美国的车上了。这是美国人的首创。这个组织能否搞成，决定于日本。日本的困难是，搞，就要得罪我们。至于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早已得罪了我们。日本是要台湾，还是要中国？我们同它的贸易关系，已经断了 3 个月，准备再断上 3 个月。他们通过四五条线来活动，想恢复同我们的贸易关系。最近，日本社会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他们甚至通过苏联商会的人来劝我们。怎么你们还有一个商会呀！目前不准备恢复。如果恢复的话，好事要让给日本社会党来做。这次不准备恢复，再等一个时期。恢复要有 3 个条件：

（一） 长崎事件[3]要处理，要向我国道歉。

（二） 政治上不从事任何敌视中国的活动，放弃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最近 3 个月岸信介对我们采取了十分粗鲁的行动。抨击和咒骂我们中止了贸易关系。我们劝他与美国和蒋介石进行贸易，因为我们不同日本进行贸易。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这个政治条件。

（三） 不能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并不要求日本立刻和中国恢复邦交，但是它应该促进而不应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暂时不承认中国，并不妨碍两国间的贸易。我们没有日本还活得下去；日本没有我们，并不一定活不下去，但很困难。

**赫鲁晓夫**：日本没有中国不行，中国没有日本可以。

**毛泽东**：重要的是，不仅是中国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而且东南亚的 1000 多万华侨也抵制日货。

**赫鲁晓夫**：这种影响非常严重。

**刘少奇**：中国的资产阶级掌控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周恩来**：这是指那些在印尼、南越、泰国、菲律宾部分地区、柬埔寨、马来

亚、缅甸部分地区生活的中国人。

**毛泽东**：形式上这是一国的代表，但实际上是两国的代表。

**毛泽东**：应该做好战争准备。首先，需要在道义方面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民忙于和平建设。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怕战争的。战争并不可怕。如果谁将其强加于我们头上，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进行战争，那么就过来吧。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苏联有原子弹。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么我们将什么都不会吝惜的。我们刚刚进行建设，如果你们把它破坏了，那么我们战后再重新建设。反正我们还没有建设好。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不想战争。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军事学说，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赫鲁晓夫**：我认为，总体上这是对的。但是不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中国要准备进攻了。我们的政策是：一方面要有强大的力量，一方面要使世人知道我们是爱和平的。

**毛泽东**：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证实，我们这里有一种事实。每个合作社，每个单位都发枪。并且说如果胆敢侵犯我们，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虽然人很多，也不要外国人的领土。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让，土地就是这么多，要保住。

**赫鲁晓夫**：在危地马拉，美国用军队把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赶跑了。黎巴嫩也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所谓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得不要求美国派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毛泽东**：国会有用，他们就用；没有用，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形式。戴高乐的宪法还要国会，但把它变成了咨询机关，和美国一样。美国的国会只是通过一下预算，争吵一下增加或者减少美元的问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权利也没有。

**赫鲁晓夫**：我们正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毛泽东**：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缓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搞紧张。中东的紧张局势是最近的最高峰。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知道，美国怕打，英国更怕打。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了，做出要打的样子，这使尼赫鲁和世界都很着急。尼赫鲁是真着急了，因为这样的紧张对他不利。英、美从黎巴嫩和约旦是早撤兵好？还是晚撤兵好？我看，不要太快，还是晚些好。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请你把这个意见亲自告诉给杜勒斯吧。

**毛泽东**：最好半年不撤，大家好有事可做嘛！撤退了，他们就又变成了好人，又变成爱好和平了。我想留他们一下。

**赫鲁晓夫**：我们没有必要害怕紧张局势，紧张局势是我们双方之间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我们要利用才对。

**毛泽东**：列宁曾经讲过这个意思。在平时教育人民需要几十年，打一次仗就教育过来了。战争可以教育人民。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险。每出一次“伊拉克”，人民立刻就紧张起來。我和尤金同志谈了 5 条：

（一） 他们的兵少。

（二） 他们内部不团结，例如，工党党员和保守党员之间存在矛盾，美国

政府成员中间存在分歧等等。

（三） 他们的同盟国不满意（如加拿大、法国、日本）。

（四） 这次使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更加活跃了，推动了和平运动。真正的和平运动不是斯德哥尔摩的会议，而是这次伊拉克事件中所出现的那些人物。甚至日本首相都被迫承认，伊拉克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东方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潜力未受到制约。因此，由于中东事件，出现了许多拥护和平运动的人士。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浪潮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看，这对帝国主义不利，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怎样在保存面子的情况下撤军。在艾森豪威尔给你的回信中有一种观点，那就是现在不存在战争的危险，他还不敢对此情况说得太多，但看得出来，他自己比谁都害怕战争。

（五）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掩盖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可以说，和平运动已发展为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有适当机会，这些斗争就会爆发。谁知道这次伊拉克发生了革命？

**赫鲁晓夫：**这次伊拉克革命杀了前首相努里·赛义德，此外还杀了 1000 多名反动分子。

**毛泽东：**这次是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地都在酝酿着革命。对西方国家的党也有利，不像匈牙利事件时，有些人退党，这次要增加一些人吧！

**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些人。

**毛泽东：**帝国主义者在广大的社会人士眼中是不公正的，真理没有站在美国那边。比如说，东德给西德写了一封信，抗议阿登纳准许美国利用西德的基地。西德向来是看不起东德的，但是这次也不得不给以答复。西德解释说，不是我们允许的，是美国人自己搞的。这很说明问题。

毛泽东：总之，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以比较的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尽管当时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英国的同盟罢工、摩洛哥的革命、中国的革命。但是，罢工停止了，非洲的革命被镇压了。在中国，蒋介石北伐取得了胜利，他对国民党组织清洗，换句话说，进行镇压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事件未能引起世界的大动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是最初 2 年相对稳定。1947 年 7 月，蒋介石开始进攻中国共产党。1949 年我们胜利了。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整整打了 3 年，然后是越南战争爆发。胡志明同志他们开始是和法国人谈判，后来也打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之间的区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保持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荷兰则保持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度的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除了印度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有：印尼、锡兰、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英、美两大帝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所受的挫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如果美国真的从中东撤兵，那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这证明帝国主义在日益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下一次大战——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之间充满着更多的事件。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在穿越易北河、朝鲜三八线、越南十七度线的这些国家，我们绝不放弃社

会主义阵营的一寸土地，并为和平而战。

**毛泽东**：劳动是很好的学习。

**赫鲁晓夫**：劳动可以锻炼人。

**毛泽东**：专门读书是不好的。在新的制度下，大学生将不再向家里要钱，因为他们将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中学也要搞些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打算把农业专科学校附设在国营农场里，这样大学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毛泽东**：我们准备把所有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

**赫鲁晓夫**：譬如，我们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有的家在莫斯科的学生毕业以后，不愿去农衬，宁肯在城里当一个擦地板工人。如果我们把农学院设在农村，吸收农民和农庄干部入学，培养他们，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留在农村工作。

**毛泽东**：非常正确。

**赫鲁晓夫**：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派人来我国考察我们的教育制度。他们回国以后，对我们的反映很好。但是，时间不过一年，我们的教育制度又要改变了。

**周恩来**：好，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方向做的。

**赫鲁晓夫**：关于改革教育制度，我们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给你们寄一份来。

**毛泽东**：愿意看。

**赫鲁晓夫**：那么我给你们寄一份。

**毛泽东**：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学校改组问题。我们正在试验。

**赫鲁晓夫**：尽管我们的条件不同，但你们也可以看看信中有关我们的改组方向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这里的问题是劳动和教育相结合。

**毛泽东**：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中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机关干部都要下去参加劳动。在工厂里，厂长这样一些领导干部都要下车间劳动，参加生产。

**朱德**：军队里的师长要当兵，受排长和连长管一管。

**毛泽东**：我们的军官过去都当过兵，我自己也当过半年兵。但他们长期脱离了士兵生活。我们一年四季地管别人，抽出一定的时间叫别人管管我们，也是应该的。叫下级批评上级，给他们机会批评上级，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还做了一项决定，所有的军官从今年 8 月开始从事生产工作，一年不少于两个月。

**彭德怀**：在军队里我们开四级干部会，军、师、团、营四级，还有连、排、班、士兵四级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约有 2000 人参加，会议开了 2 个多月，通过了许多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互相展开了批评。军委的同志都受到了批评，我和彭德怀同志也受到了批评。召开这种会议就是由外交部部长陈毅提倡的。我们一直对参加会议的人发号施令，就让他们稍微管一下我们，说出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 8 周内，我们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当然，不只批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受到批评，特别是那些缺点严重的人。

**彭德怀**：通过会议上的批评，一些军官现在讲到，对他们的批评真好。另一

些军官因此明白，他们对下级的批评有时候是错误的。

**毛泽东**：我们对所有路线的干部实施类似的制度。其实质归结为：

第一，所有人都应当从事体力劳动；第二，给下级批评上级的机会。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将此种情况称之为整风运动。英国人将之称为“肃清”运动。

我们在 6 亿人民中进行了整风，没有整风，也就没有今天的“大跃进”。他们不满意，领导有缺点，他们批评了，心中就很舒服，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热情和干劲。我们中央做了决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 2 个月在下面。这不会损害政府的工作，反而有益。

消灭盗窃、赌博等现象，也都是采取整风的办法，很有效。

**彭德怀**：这是一个处理违反纪律情况的好方法。在军队中，我们取消了禁闭室，因为那里无人可关。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节日和阅兵式以外，军官和士兵完全穿一样的服装，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恢复我们过去的做法。战争结束后，由于物质状况的差别和其他一些原因，军官一时脱离了士兵。

**赫鲁晓夫**：你们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我们在革命初期也有过，譬如列宁参加义务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等等。

**毛泽东**：我们有一项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一年内至少有 4 个月在农村从事生产。只有在处理文件时，才能脱离工作。开现场会议，哪里高产就在哪里开，哪里的麦子好就在哪里开。会议不一定都在北京开，越在北京开会，脑子就越空。今年上半年，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下半年我们还想下去。

**彭德怀**：我们的军队每年帮助农民 2 个月，而且并不影响军事训练计划的完成。

**赫鲁晓夫**：我们的元帅对此不敢苟同。

（根据苏联方面的谈话记录稿摘录刊印）

**注释**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匈牙利事件，1956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

[3] 1958 年 5 月 2 日，两名日本人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强行扯下悬挂的中国国旗，制造反华事件。为此，中日贸易于 12 日全面停止。

#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一日、三十日）

## 一 八月十七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同志们还可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铝问题。钢由五七年的 530 万吨翻一翻，达到 1100 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谭震林[1]同志负责。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2]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 6500 亿斤，每人 1000 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 1500 斤，后年 2000 斤，是否搞到 2500 斤至 3000 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发展粮食，我看超过 3000 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陆定一[3]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是 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

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他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的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有人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像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只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4]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枝枪，全国共需一亿枝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 二 八月十九日的讲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粗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 100 万吨钢，用到那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 2700 万吨要完成，今年 1100 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5]。机械的头是赵尔陆[6]。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

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拚几年命，以后还要拚，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同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拼命的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 三 八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保证重点，明年搞 2700-3000 万吨钢，50 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

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高炉、平炉、轧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寃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 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 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苏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列宁曾说，要打破常

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刘子厚[7]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有些同志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8]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粳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它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

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 四 八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的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的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有人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等人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

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寃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主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超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

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同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有同志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

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五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 五 八月三十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干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

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 2500 万到 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

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 3000 万吨，后年再增三千万吨，苦战三年，基础就搞起来了，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　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

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

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

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注释**

[1] 谭震林，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19]。

[2] 先念，即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4] 何应钦（1890 年 4 月 2 日－1987 年 10 月 21 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1916 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 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7 年 4 月 9 日，何在南京直接调兵包围江苏省党部和省总工会，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又令军警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逮捕全体共产党干部。何的东路军 26 军在上海对工人纠察队进行突袭，大规模剿杀共产党员，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惨案。1945 年 9 月，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

[5] 王鹤寿（1909 年 4 月 19 日-1999 年 3 月 2 日），河北省唐县人。时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员、科学小组组员。

[6] 赵尔陆(1905 年 6 月 4 日～1967 年 2 月 2 日)，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北三泉村人。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7] 刘子厚（1909 年-2001 年 12 月 22 日），河北省任县人，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8] 高岗、饶漱石，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 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一九五八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

## 一 九月五日的讲话纪要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一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大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什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有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自行车、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

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到一千一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如果明年加一年，是超额完成，十二年计划，四年超额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起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迫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觉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是历来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的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后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走得太快了，似乎一个时期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又不灵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中学教员也好，文化界的人也好，新闻界的人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还要形势迫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

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科学技术界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老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嘏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头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迫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人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椗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了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的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1]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2]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

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它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它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赛尔[3]，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这三个军事团体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过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条件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就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4]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得放，等于我们右派的毒，你得让他放。你不让他放，他总是有毒的，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于我们的利害怎么样？资

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好，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5]。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6]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起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弹。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

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7]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 二 九月八日的讲话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8]，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比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9]。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形，那个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赛因[10]和黎巴嫩的夏蒙[11]那样好？他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12]，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

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想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们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五千万吗？苦战三年，五千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五千万，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五千万，接近苏联，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

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 三 九月八日的结束语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13]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四千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四千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〇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二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以上到三百。到三百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四百三十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就到了四百。明年应该是五百几或者六百几十亿吧？也不要五百几，也不要六百几，一下就搞到七百几十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七百二十三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四百三也只有一年，五百没有，六百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七百二十三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四千亿，平均每年八百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〇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搞三百多亿或者四百多亿吧？都不是，一下就可以搞五百多亿。前面这八年，五〇，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

有二百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五百亿就可以当作一千亿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帐。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这几个月出来的新事件。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去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真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没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饼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同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铁矿的矿山机械，开油矿的钻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化工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加工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没有钢铁，机械就没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二十几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三十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三十万台，后年再搞五十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个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台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三十万台，一年三十万台！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明年就可以搞三十万台，后年搞五十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三十万，后年五十万，八十八万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一百多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注释**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李承晚，当时是南朝鲜政府总统。吴庭艳，当时是南越政府总统。

[3] 纳赛尔，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4]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当选法国总统。

[5] 何应钦，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一九五〇年后担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6]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以主张办工厂、修铁路著名。曾任清政府湖广总督、军机大臣。
[7]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8]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9] 杜鲁门，美国前总统。
[10] 侯赛因，当时任约旦国王。
[11] 夏蒙，黎巴嫩前总统。
[12] 斯摩特，当时任驻台湾美军司令。
[13] 据新华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报道，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视察天津大学时，谈了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报道说，毛泽东对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毛泽东又说：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对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同志的复信。

恩来同志：

十八日夜来信[1]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2]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毛 泽 东

九月十九日上午四时于合肥

**注释**

[1] 指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夜周恩来同志就中美会谈和沿海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请示信。

[2] 王炳南(一九〇八——一九八八)，陕西奉天(今乾县)人。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叶飞，一九一四年生，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 巡视长江流域数省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新华社30日讯　毛泽东主席最近巡视了长江河域的几个省。毛主席9月10日至15日在武汉，看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出铁；会见了工人群众；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1]看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们办的许多小型化学工厂，同武汉大学师生见了面；[2]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同工人见了面。在武汉同各方面的干部见了面。[3]15日，毛主席由武昌经鄂城、大冶到了黄石港，沿途看了丰盛的农业、大冶铁山、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群众见了面。16日上午，毛主席到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会见了安庆人民群众。当天毛主席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城，沿途经过桐城、舒城、肥西三县，看了丰盛的农业，看了一个人民公社[4]。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广大的人流。毛主席第一次访问了合肥城。在这里，毛主席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看了农具展览场；又看了工业农业产品和发明的展览馆。毛主席在合肥会见了干部[5]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芜湖，看了工厂，会见了干部。20日毛主席到了马鞍山钢铁厂[6]，会见了工人和市民群众。毛主席20日到南京，跟干部们见了面，然后到上海，会见了干部，看了一个钢铁厂。毛主席已经在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主席对本社记者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对记者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90％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

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 注释

[1] 据新华社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报道，毛泽东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和武昌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在视察中毛泽东指示说，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他还指示说，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在大冶铁矿区视察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那里在进行基本建设过程中所实行的大包干的办法。他在听取了矿区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载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2] 新华社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还报道了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的情况。报道说，毛泽东视察时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他还指示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3] 毛泽东这次在武汉会见各方面干部的情况，报道不多，只有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七一》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五期发表的《札记二则》，其中说：有一天下午和毛主席同车到第一纺织厂参观小高炉出铁，谈起了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和农民的苦干精神。毛主席问我："你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庆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肉，喝点酒……"。我说："好，就在国庆节那一天，庆祝国庆，庆祝丰收。"主席说："那么要发个指示，不然会有人说是铺张浪费。"此外毛主席还告诉我："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另外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指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据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徽日报》报道，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个公社办了公共食堂，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4] 《安徽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报道中，还谈到毛泽东在合肥期间和妇女干部谈话的情况。毛泽东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毛泽东指出，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5]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徽日报》还报道了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视察的情况。报道说，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冒雨看了这个厂的五号高炉，炼钢车间，七号、八号高炉，详细询问了各种情况，毛泽东说，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报道说，毛泽东视察了安徽省几个钢铁厂以后，着重谈了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他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 在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

## 一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

祝同志们健康，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更大发展，为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而奋斗。要不要战胜帝国主义呀？总有一天要战胜它吧！当然不一定是明天早上，明天晚上也可以，后天早上也可以，总要战胜它吧？帝国主义总是要战胜的。打么，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这次有好几个军事代表团来，你们是准备文打还是武打的？我们有这么些军队，难道有军队我们不准备开枪的吗？当然是准备开枪的喽！这是我代表你们回答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如果敌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拿出这个手段来。

你们会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自相矛盾，既然这是最后才拿出来的手段，为什么还在金门打炮？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抛入一个窘境，很难回答。

金门打炮[1]，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打了三十一年，一九二七年打起，还要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打七十年吧，合起来就是百年战争。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2]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3]，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4]，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看来世界人民在金门问题上真正受到了教育。情况还将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现在也有利于我们，将来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他总是拿朝鲜相比，说共产党又在搞朝鲜战争啦！人们说不像嘛，朝鲜是朝鲜，金门是金门嘛！金门只有那么大，只有一个酒杯那么大。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

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黎巴嫩，我也是不愿美国走得太快。美国走了，好!它又是爱好和平啦!这次在黎巴嫩逮住了美国[5]，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一九五六年在苏伊士运河，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6]。那时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这次在黎巴嫩，美国可被我们逮住了。我说它最好多呆一点时间啊!我跟赫鲁晓夫同志商量过，他也赞成我这个意见。至于美国呆多少时间，三年好不好?恐怕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不同意，要它走得快一点。美国也可能不要好久就开走了，因为它混不下去了。唉呀！我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哇！想留它多住呀，它就要走了。

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如何。也许在几个月内它在黎巴嫩就可能开跑，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可以使它多留。台湾海峡这件事，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教育工具，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有相当大的教育啊！你们不相信哪？好！那末打起仗来怎么办哪？谁要打仗啊？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呀。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这个教员哪，我们又要感谢他又要惩罚他，也给他以批评嘛。学生也可以给先生以批评，就是用大炮批评他。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在该统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工作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前提和在苏联的领导下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必须对你们说的是，近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老师，那就是铁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铁托这个人，那么我们和你们可能会更困难些。

铁托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不想在我们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人还公布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和接受苏联的领导。很显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同志，另外可能也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在内，已经对这位“老师”的做法很不耐烦了。

对于中国而言,在教育我们党和人民方面铁托可谓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为此,我们同样是不用花钱的，学费都是美国人来交，而且价格不菲。

严肃地说来，当世界上出现了像铁托这样的典型的修正主义者之时，我们在教育人民方面就轻松多了。过去，我们对铁托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如今我们应当重新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并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要教员。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么杜勒斯当仁不让地应属第一，其次便是铁托。没办法，我们的中国教员——蒋介石只好退居第三了。

## 二 国内大跃进形势

苏联同志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另外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帮助。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可谓相当巨大，对此，当你们在中国各地参观时，便会亲眼看到。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 4 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

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等。他们——中央委员和各省党委书记均认为应当这样写："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只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对是否真正存在大跃进的疑虑有所减少了，但不是全部。你们可以因此而称我为机会主义者，或右倾分子，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后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

8 月份，我们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党委书记也都参加了。由于在 8 月份我们已收获了主要的收成，我的疑虑也随之减少了 99%。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秋季作物。因此，直到收获秋季作物之前我这 1%的疑虑就会一直存在。万一老天忽然不再帮我们怎么办？不过，即使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已达到了 3.55 亿吨，即比去年粮食产量(1.86 亿吨）超过 1 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是可以断定的，但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 60%—70%。我们暂时将不公布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全部粮食。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对外公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数据，对外只能说的是：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多出 60%—90%，但并没有超过 100%。因为我还有的疑虑没有消除，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粮食都收到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但现在我们都明白一点，即只有提高钢的产量，其他所有生产也才可能提高。让我们以机器制造为例。如果没有钢，机器制造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与此类似。为了生产钢，我们就必须有煤和电，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还必须发展交通和船舶制造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喊起来：这个没有，那个不足，机械业落后，交通运力紧张，等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混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才会极力去生产我们还欠缺的所有东西。没有电力——就需要我们去生产电！出现了矛盾 这是件好事。难道我们会害怕矛盾吗？有了矛盾，我们才会去解决，并一定要解决好。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 535 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 620 万吨，然后再增加到 750 万吨，接着再提高到 900 万吨。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 7 月 16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 2 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 1070 万吨。但在 8 月份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可能，你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一切都好，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今，我们已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搞工业。虽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没有如此高度地重视它。只是从 8 月份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抓工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 2 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 3 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 2 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总之一句话，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时刻，我仍想对自己的观点作一个小的保留，我不想把关于农业方面的话说得太死。因为这样的话，得等到秋收之后才能说，而关于今年钢的产量，得到年底再看。我相信，如果今年我们能生产出 1000 万吨钢，那么明年钢产量达到 2000 万吨，那无疑就变得容易多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原有的建设计划是按 12 年制定的，但很多按 12 年制定的指标我们只用了 3 年便完成了。

至于明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们得重新编制。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 12-15 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 2-3 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 5 年、7 年或 10 年时间。我认为，在船舶制造方面我们在这一期间内（12-15 年)是无法赶上英国的，但周恩来和邓小平断定我们在 12-15 年之内能够在船舶制造方面赶上英国。要知道，英国船舶制造业方面是相当发达的。

我认为，中国在工、农业方面的振兴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们，对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都是有利的。

人民公社仍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中各行业、集团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差别，保障水平也不均衡。事实上，今年我们的粮食是能够满足供给需要的，明年如果还是一个丰年的活，粮食供应情况仍将跟今年一样好。只是在穿衣方面我们还比较困难。正是列宁曾经说过的，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领域我们将仍保留“资产阶级的权利”[7]，如工资体系中的 7-8 级差别。但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将逐渐地消除这些差别。

**注释**

[1] 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我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金门炮战一直延续至一九七九年元旦中美建交时停止。

[2] 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3] 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首领。早年曾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后被开除。一九二一年组织法西斯党，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

[4] 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

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〇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〇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5] 指一九五八年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事件。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6] 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7] 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0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1]，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2]，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3]。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br>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注释**

[1] 指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2]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杜勒斯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3]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 46 页注释[21]。

#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

尚昆[1]同志：

此件[2]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 1958 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 70～80 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 1960 年冬或 1961 年春，我们就有大约 2，000 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3]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4]；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　泽　东

十月十一日

**注释**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卫生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除一般在职学习外，还重点组织了六个离职学习班（二百零三人），以便进一步广泛推行西医学中医，并培植出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学方面的骨干。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的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症、教学和研究工作。

[3]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4]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很好，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1]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 时

**注释**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 再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1]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张作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六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后退回东北，因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惇元[1]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 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α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六日、七日、九日、十日）

### 一 十一月二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一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纣，也是如此。

[陈伯达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陈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③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④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2）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没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内争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

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像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的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合“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的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铝、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辅。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辅。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堤、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根本不依靠硫酸铵。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 二 十一月六日的讲话

只搞两个月，就搞出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纲，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纣是否三化？自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

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1]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高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一四一二一十制，工人最好是八一四一二。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查。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地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二十五年，北方要四十——五十年，种树也必

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侯，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镁、钾、钠、锗、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 三 十一月七日的讲话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

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的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门。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放不下为公社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 四 十一月九日的讲话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

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纲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只口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卫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三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三十九条，一则以喜（作社员），一则以惧（保姆，高薪）。要对工人讲清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一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

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　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解作用，起调解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有人插话：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斯大林说了许多理由，消极方面有没有？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问题。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即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粮。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茶、蚕、丝、棉、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钱，就发不了工资。

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可发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一种只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粮食以外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工业化。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 五 十一月十日上午的讲话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

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合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一点。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 六 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诂”，是不对的。诗有达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则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

认识客观法则才能去驾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则？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人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有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作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斯大林说：

“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母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2]等同志知道的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如像苍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闹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没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 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 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没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 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同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

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 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 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剂），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

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黄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这是山西的话。不断革命没搞，停顿了。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接受的。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母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〇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芝圃[3]同志也不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蒋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注释

[1] 四十条，即《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或《1956 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提纲挈领的要点。

[2]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3] 吴芝圃，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9]。

# 关于读书的建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什么？如何过渡？结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好好议一议这些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斯大林说，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明得不够；第二，没有说出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要能够正确，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斯大林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这个论点不对。他没有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的，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的，将来能够改造。

斯大林说，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人们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是被人怀疑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三大敌人被打倒了，证明我们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胜利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农业都增了产，又证明我们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如果农业无人负责，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这不好。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这些也是成都会议提的。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是他们的一个创造。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试验田是湖北人提的，现在变成了全国的口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消灭了任何剥削；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创造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方面，任务困难和复杂，我们与苏联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处就不多了。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

斯大林说，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

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指出：“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要求的。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但是缺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这个辩证法，我们也只是最近摸到的。没有钢，就没有机器。有了钢，就能够有机器；有了钢，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就都好办了。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建设。斯大林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他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

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中国和苏联的比较，促使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十大关系、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的问题，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接着出现了一个跃进。不久发生了反“冒进”。经过整风反右，一九五七年底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大跃进。经过曲折，得到了“马鞍形”的教训，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了一条路，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大家动脑筋想出来的。实行过程中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到底还是灵，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反映得比较完全，还是反映得不够好呢？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客观过程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因此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理解它。例如，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和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大和中央，是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论，不是多元论，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能够把一切带动起来。

斯大林指出，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消灭、创造规律的提法是不对的。之所以不对，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那里无政府，在社会主义这里有政府。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毛主席说，第二、三章讲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

斯大林说，苏联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这些同志大错特错。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一切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分析的对。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

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斯大林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这里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问题。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

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斯大林说，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是一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这样做将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从而摧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在这里说，在苏联有“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五年征购数字定为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减少近七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斯大林说，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合作运动计划”等文章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乙）将工业中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丙）逐渐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不要剥夺集体农庄。

毛主席评论说，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戊）为实现城乡、工农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把所有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

毛主席说，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说：“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

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说，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一九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斯大林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

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斤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了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

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奴隶时代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胎中，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

斯大林说：“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这个话说得对。我们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

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时间达六年之久，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这样三个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好好讨论。

斯大林说，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评论说，把书中的“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斯大林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毛主席评论说，书里面的“现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有九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

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曾经设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设想的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了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够像鞍钢一样？什么时候能够把农业劳动变成工厂化劳动？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就不能丰富，就不可能直接调拨，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拿鞍钢的生产水平来说，平均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产值是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旧外，还有一万零八百元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国家的收入。很显然，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达到这种程度，需要经过很大努力。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们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曾经耐心地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勒斯、蒋介石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佬就是要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的做法不了解，我看要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国人不搞了，事实上承认了我们规定的十二海里国界线，可见得还是灵。

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斯大林说，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

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毛主席在评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时，特别指出，商品生产消亡的条件，除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还有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这一条。毛主席说，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斯大林说，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

毛主席评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经过整风反右后，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变，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毛主席说，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照斯大林的说法，是没有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斯大林在给雅罗申柯的信中说，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认为苏联的当时已经是共产主义，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只搞了九年，则差得更远。

斯大林说，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棉、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这种赔钱，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经验，要花学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从长远利益看，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

**答А·И·诺特京同志**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成为商品的只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斯大林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在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时，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中。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斯大林说，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第二，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毛主席评论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必须确实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这是基本的。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

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

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不愿意划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3、“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此，需要减少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说“自由地选择职业”，我不太懂，搞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挖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学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搞得没有饭吃。

斯大林提的三个决定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提倡共产主义的因素，割裂重工业和轻工业，不重视农业，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足够重视消费资料的增长，没有按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缩小三大差别，反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关于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毛主席评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

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

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 答A·B·萨宁那和B·Γ·温什尔两同志

斯大林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最后这封信中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他把国家和集体农民对立起来，不信任农民群众，死死抓住拖拉机不放，理由是说不通的，自己骗了自己。你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斯大林在书里，反复说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怕；而这里又强调为了不使商品流通扩大，不能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又说，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他们负担不了，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这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国家就损失得起？

两个过渡，他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书里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说也说得好，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很苦闷。但是他说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主要调节是计划而不是价值法则，这很对。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

### 注释

[1] 参阅本卷《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 一 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

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 104 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

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有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有人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 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 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

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1]插话：达到 150 元到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彭真[2]：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 150 元到 200 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3]，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插话：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了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王鹤寿[4]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5]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6]，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7]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

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规定有使用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是人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8]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有人插话：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刘少奇插话：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

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 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9]？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

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

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吕正操[10]，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刘少奇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

你真是思想解放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插话：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有人插话：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

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有人插话：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插话：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11]：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奸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王任重[12]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

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母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有人插话：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13]：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插话：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人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

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 注释

[1]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3] “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

[4] 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5] 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6] 张霖之（1908—1967），原名张朝明，河北南宫人。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7] 李葆华（1909—2005），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8] 陈漫远（1911-1986），又名陈万源，广西蒙山人。1956.06～1957.06 任广西省委书记，时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9] 刘澜涛（1910 年 11 月—1997 年 12 月 31 日），陕西米脂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0] 吕正操（1904 年 1 月 4 日 — 2009 年 10 月 13 日），原名吕正超，字必之。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人。时任铁道部代部长。

[11] 江渭清（1910—2000），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 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 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1961 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2] 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3] 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谈话的要点。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1]，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2]。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指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

[2] 见《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2]。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

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3]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注释**

[1]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 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开始，组织六百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二十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3]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一本干部学习材料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

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1]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

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

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2]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

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 Q 味道，但是一点阿 Q 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注释**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黄炎培，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荣毅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2] 高饶事件，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莫洛托夫，即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 年 3 月 9 日－1986 年 11 月 8 日）。在斯大林时期，他是斯大林的亲信，成为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支持斯大林的

农业集体化政策并参与指挥了大清洗。莫洛托夫事件指：1957 年，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以 8：4 票的表决结果，将赫鲁晓夫罢免。赫鲁晓夫得到消息时抗议说，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决将他罢免，才算合法。在朱可夫元帅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集合了起来，决定解除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1957 年 6 月莫洛托夫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 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

# 对《张鲁传》的批注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 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1]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3]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二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4]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5]，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6]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7]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8]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9]

七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10]

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11]

九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2]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之国:都城。不是 State，也不是 Country。[13]

十一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14]

十二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15]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的批注。

[2] 引用的鲁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唐宋传奇集》上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次年二月续出下册。

[3] 陆放翁，即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击水”的批注。

[5]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

[6] 这是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心潮”的批注。

[7]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菩萨蛮》，指《菩萨蛮·黄鹤楼》。

[8] 这个批注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那一页的天头上。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9]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长征》一诗中“水拍”、“三军”的批注。

[10]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苍龙”的批注。

[11] 这是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批注。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发表的这首词和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本词下阕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国”，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

[12]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雪》一词的批注。末三句，指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3]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一句的批注。

[14] 这是毛泽东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批注。其中所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一典有误。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武昌鱼”的注释是：“据《三

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鲍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15] 这是毛泽东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批注，指“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

#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要培养新生力量，没有年轻的哪能写好文件？

过去不是有人说干军队没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战时有奔头。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可以成为多面手，一专多能，学会很多有用的技术。

金门打炮对部队士气有没有影响？还是不要打？（答：部队情绪高）闹个人主义的时候再打他一下。我们对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政策，大家赞成不赞成？是不是很得人心？要就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门我们就不拿。杜勒斯说，中国人不好谈，对金马无兴趣。假如杜勒斯丢下金马走了。我们怎么办？请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政治家，一个办法是去占，我们可以控制台湾海峡一半。便于南北的海运，一个是不去，搞个无人地带，以表示我们兴趣不在这里，而在台湾。这时一定会有很多舆论，舍不得。我们不去，很可能蒋介石又来占领，这更好。我们不要他走。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

现在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称贵我双方？为什么不打敌人司令部，为什么还答应在对方请求的时候供给他们“以固守”？同志们可以议一议。如果金门的敌人真叫我们供给，那倒是好事，那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在此次军工会上，可拿一天时间谈谈形势问题。过去，《人民日报》的同志对我们对台澎金马的政策问题想不通，新华社的同志也讲不通，周总理报告了，分头研究，才搞通了。在此次政工会议上可以大鸣大放一天。这是政治问题，国际形势，离开形势，政治工作不好做。过去的规矩，第一是讲国际形势，第二是讲国内形势。第三是本部队。过去那些有点形式主义，如一点不搞就不好了。形势问题至少讨论一天。

四国共管柏林，是德苏战争结束，苏联打得精疲力竭时，斯大林同意了的。尤金大使曾告诉我。苏德战争中苏联死了两千万人，可能包括战区的男女老幼。苏联近两亿人口，就算他有五千万壮丁。作战死去一千万壮丁。问题不算小。苏联同志们，斯大林在那几年中能取得那样的胜利，已经了不起。斯大林为什么不要我们和国民党打仗呢？因为国民党就是美国人。一方面他把美国夸大了。另一方面把我们看小了。后来斯大林承认他错了（一九四九年夏）。他曾问过别的同志，他说的话在中国有无影响？回答说，没有影响，因为你们提出的，我们没有执行，也不能执行。一个共产党指挥一个共产党，奇事。因为当时没有第三国际了。其实蒋介石硬要打你，你不打怎么办？……美国也怕我们——怕我们蛮干，不怕死。别的他也知道，无非是手榴弹那一套。还怕我们的将来，今年是钢翻一番，粮食那么多。真让我们搞七、八年，可了不起。

杜勒斯怕人民公社，而且怕得很。他总研究人民公社，骂我们两条。一叫拆散家庭，二叫强迫劳动。这也是战士关心的问题。家庭要不要拆散？有没有这个问题？劳动是不是强迫？如蒋介石强迫老百姓那样，还是自愿？我看基本上还是自愿的劳动，老百姓看到了这样的劳动结果能迅速增产。只要我们让他们睡足觉，

每天睡八小时。一定要强迫，你不睡不行。

过去出工，自由主义，阴一个，阳一个，我们学军队的办法，准备出发，十分钟可以完吗？出发很快，整整齐齐。还是整整齐齐好，还是阴一个阳一个好？过去各家吃饭．这家煮得早，那家煮得晚，上工稀稀拉拉要三小时。现在一个食堂吃饭，议事。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方便。上工整整齐齐，只要一小时。

政工会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有些什么问题。（众答：房子问题，男女分居问题……）分居有几个星期，扎野营你不分居怎么办？这次人民公社运动比合作化要顺利些。由个体到集体比较难。合作化和现在的变化哪个大？

（谈到部队内民主作风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样整整齐齐的军队还这样，公社刚办起来，有点缺点就议论纷纷。公道不公道？过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三个月不搞就忘得干干净净，天下大乱。还不是每天搞，每个礼拜搞？

小锅子还是要恢复。可以炒菜，做饭，大集体，小自由嘛！自由主义搞光了不行。

对领导方法简单的农村工作干部要说服教育。过去，军队里的官长只要兵不听话就打，把打人当作最后的手段。后来我们实行官长不打士兵。许多班长就没办法了。经过说服教育慢慢地就改过来了。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兵还是可以带走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不是写一个文件吗？现在看那样的文件，哪有现在这样进步？问题那么多．没有发挥。

公社一个连长要领五百人。实际上是一个营。有男女老幼。不如军队好带。

去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巩固合作社。现在五六～五八年、加上明年，四年之内使人民公社上轨道。使干部学会带兵——男女老幼，又管生产，又管生活，又管思想，又管精神，又管物质。

把过去的区乡干部转为公社干部。政社合一，县政府就不要了，县级干部转为县联社的干部。县委全就是县联社党委，加上下放干部。

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吗？得有三化。姜太公当政委，武王是司令员。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三化是军队发明的。组织不军事化怎么打仗？从来军队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好，乡村搞不得？广州市有没有公共食堂？死了人没有？（朱光答：有食堂，死的都是该死的。）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点不会犯原则错误吧。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一九五五年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候，谁料到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一整、波匈事件，一两周之内，天下大乱。这是坏事，没有料到。有好些事也没有料到，如今年的大跃进。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这件事我就没料到，人民公社也是没有料到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时都没有想起人民公社。七月份还是没有想过。

钢铁翻一番的问题。是在游泳池里和王鹤寿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

还有军队起变化。今年一月份我找几位部队同志谈话时，罗荣桓同志讲有落

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军委开了五十五天会，以后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解决了。现在空气不是改变了吗？还不是有希望吗？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八个文件，是去年就计划好了吗？我不相信。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大跃进，干部当兵，民兵大发展是从北戴河会议之后搞起来的，一个多月，北京搞了几十个民兵师。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许多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

（谈到看问题要看到两种可能性时）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你们广东就有省委书记想搞分裂嘛？我们的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不准备就被动。列宁总是不避讳。他常常说：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解决。还是帝国主义灭亡，还是我们灭亡，中苏社会主义十二个国家是共同命运，无论如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暂时灭亡，部分灭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会崩溃一部分。没有坏处，这部分的失败有好处，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你们准备垮台就不会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们可以进行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

社员有退社的自由。我们这次决议上没有写。工厂的工人可以跳厂。鞍钢那么大，工人自己一个人要成立一个鞍钢是困难的。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似乎与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论点不符合了。这还是符合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托儿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彻底崩溃是不会的，我们总还可以打游击，还有民兵在手里．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云南去。我与民主人士讲过，他们都笑笑而已。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还是留在北京搞维持会呢，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呢？这样好像与美帝是纸老虎不符合了。所谓纸老虎，并不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武王不伐纣，纣不不会倒。帝国主义还活着。经过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风浪。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不让敌人登陆。登陆了，可以打败它。或者就是登了陆也只占领少部分地方，这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苏德战争，德军打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不是苏联崩溃。但是那是危险的。第二个可能也要估计到，要受损失，部分的，暂时的。

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闹别扭，对我们有利。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西方世界闹别扭，不带革命性；纳赛尔反帝是有革命性的，但是他们一面反帝，一面本国又有反动的部分，如印尼右派。

把各国因素合起来看，巩固因素第一。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仗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写保票，总还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性，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

活老虎能转化为死老虎．铁老虎能转化为豆腐老虎。估计两种可能性，说东风压倒西风，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说通了，在座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说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两方面都要估计到。

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准备？河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听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他的面色发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国的

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我的讲话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议。一个人也有两种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广州军区一千台汽车三个月之内运输了许多物质是好事，但是有些人伤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没有？有个县委书记被碰伤了，他事先也没有想到呢？部分的，暂时的损失随时都要准备。三个月之后总要进步一点，老是这样搞还行哪？

朝鲜打仗，研究时有时觉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线有一个师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会吃人的。战术上，具体工作上绝对不要轻视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

# 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用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又用他们，又同他们作斗争。所以是很复杂的工作。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性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北京有三十四个高等学校，我们让他们造反。有一个时期他们占上风。闹得天昏地暗，好像共产党就要灭亡了。这时候。我们准备反攻。经过几个月的辩论，驳倒了他们的谬论，多数人争取了过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然你们那边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们离敌人太近了。在我们这里。在每一个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右派想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让他们尽量讲，我们一个月没有说话。并且给他们登报。这就给他们照了像，再也收不同去了。然后，我们就组织队伍，进行反攻，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右派的政治资本没有了，可是中间派当中还可能有人反对我们，世界上有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会再来。我们要有准备。

#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1]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

要宣传、讨沦、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

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粮食，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担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 7500 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咸。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

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刘、周，重点在刘，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

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 500 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注释**

[1] 林希翎（1935 年-2009 年），原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1957 年开始“大鸣大放”时，林希翎从 5 月 23 日至 6 月 13 日在北大、人大演讲 6 次，发表许多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思想和领导的错误言论。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1979 年 7 月，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案作出复查结论：“不予改正”；北京市人民法院同样驳回林希翎上诉，维持原判。她至死仍是不予改正的“六大右派”之一。

#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1]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

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 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 5500 万吨钢不能和我们 1000 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 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的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 25%，这就占四分之一，生产费 20%，群众分配 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 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 1953 年为止的三十年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

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政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 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这是好心，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 25％，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 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 25％，生产费 20％，群众分配 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节录。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这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篇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部重要著作中总结了我们党从 1958 年开展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对“五风”应当坚决批判，并规划了 1959 年及之后大跃进的主要任务。

## 一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1958 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 年. 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 1958 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 1958 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 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 1958 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 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

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

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 1958 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

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 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 1959 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 1958 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

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 1959 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 二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 50%，生产费用占 20%，农民实际所得 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 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 30%，他就加 15%，实际上是 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 70%，消费只占 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的

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 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的提积累，要正当的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的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采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 60 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 380 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

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 1953 年到 1956 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 1958 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 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 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 26%连同税收 7%为 33%再扣除 1959 年的生产费 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 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 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 180 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 1958 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

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没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抢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 30%到 40%），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 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人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 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 年公社积累不超 18%，连同国税 7%，总共不超过 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 三 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 11 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 20%，积累、税收 50%，农民只分到 30%，瞒 15%，实际拿 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 18%；，加上国家税收 7%，共 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那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

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 年到 1956 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 1958 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 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 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 26%，如税收 7%，共 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 1959 年生产费 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 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 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 1958 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 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

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 220 元，结果只分给 130 元，砍了 90 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 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 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 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

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 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 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 1959 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 18%，加国家税收 7%左右总共不超过 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们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 四 三月一日的讲话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 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采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 五 三月五日的讲话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

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雕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 1921 年的事，到现在 38 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

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有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 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 7 月 14 日革命成功，美国 15 日占领黎巴嫩。我们 8 月 23 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

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 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 30%，瞒产私分 15%，共 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

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 70 万个小社，一社 50 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

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 六 讲话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的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的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作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社）。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炼、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 郑州会议纪要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部著作中提到的“十二句话”，即指本文第(二)部分，最终定稿为十四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2]，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来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5]。“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注释**

[1]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2] 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3] 周小舟（一九一二——一九六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4] 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 “三定五放”，是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三定”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一）下放劳动力，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清理，抽回一部分给原生产队，投入农业生产。（二）下放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等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并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给生产队经营管理。（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
[6] 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

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注释**

[1]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1]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三月二十六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南汇、川沙两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大体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段大鸣大放，揭露问题，分析原因，提高认识；第二段讨论管理体制、政策和具体贯彻执行问题；第三段组织一次生产大高潮。目前两县会议都在讨论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同时又向会外群众作了广播。事实证明，召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群众的动态一是担心再变，二是顾虑下面的干部能不能贯彻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关心工资问题。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 关于西藏平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十七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二十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1]和阿沛[2]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3]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4]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

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5]。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6]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7]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8]。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

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9]，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0]。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1]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2]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 注释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一九一一年生，西藏拉萨人。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3]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4]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5]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毛泽东主席让我告诉你，

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6] 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7]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8]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一九四八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9]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协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生效，有效期八年，一九六二年六月期满失效。

[10]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达赖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11] 指周恩来总理即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2] 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

#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篇党内通信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数篇党内通信中最重要的一篇，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力反五风的思想观点和具体措施，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诵，无不引以动容。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

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

[1] 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 工作方法十六条

（一九五九年四月）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工作方法九条，此后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增为十六条。本篇是根据“九条”的传印稿和“十六条”的两种传抄稿整理的。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

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做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

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

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脉。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待，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者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导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导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你说没有，不好。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七月二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2]，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3]，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4]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5]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

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6]。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7]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8]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

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注释**

[1]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 王国藩，一九一九年生，河北遵化人。当时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

[4] 八大二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5] 陈云（一九〇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6] 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293页注[1]。

[7]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 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

#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1959 年 7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是又一篇纠正错误倾向的重要文献。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1]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要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

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2]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

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说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

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去，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

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我讲食堂，走了题了。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去，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科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载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

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载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3]），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4]、责任在王鹤寿[5]，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

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6]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7]，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注释**

[1] 龙云（1884.11.19-1962.6.27），彝名纳吉岬岬，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1949 年 8 月 13 日，龙云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陈铭枢，见本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 罗隆基，见本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章伯钧，见本卷《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

[2] 毛泽东同志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

[3] 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4]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5] 王鹤寿，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6] 柯庆施同志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极为毛泽东同志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

[7]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

#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等人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一个批语。本篇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两篇著作，都是毛泽东同志批评彭德怀等同志的文章。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为了防止党的分裂，保证党继续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折衷地作出了批判彭德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2]，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 的俄国革命[3]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 1919 年、1921 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4]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5]，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

##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

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一九一七年八至九月《国家与革命》、一九〇七年二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一九〇七年七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2] 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得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失败。

[3] 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预演。

[4] 指列宁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这两章文章均被节选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毛泽东下文引用的几句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中被节选的部分。

[5]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等人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1]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2]，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3]，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4]、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

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注释**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在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铅印件上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短信说：“那个文件系刘澜涛同志和其他两个同志选集的，印时把北京来信漏掉了，没有把刘澜涛同志的信一道印上去。现送上给你看。”刘澜涛来信，指刘澜涛八月二日为送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小册子给彭真的信。后来印发《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时，毛泽东批示将彭真和刘澜涛的信都附印在后面，并将彭真的信抄改了一遍。

[2] 高饶问题，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4]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罗章龙，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张国焘，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臧克家徐迟[1]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

**附录**

**《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越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注释**

[1] 臧克家，当时任《诗刊》主编。徐迟，当时任《诗刊》副主编。

#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

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 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

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某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某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 1924 年，一个是 1938 年，1939 年，1940 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

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癞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同志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

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万里[1]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万，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万里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注释**

[1] 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 同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

**H.C.赫鲁晓夫：**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1]信件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不能总是急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而要使其退居次要位置。艾森豪威尔信件的主要意思是：不要战争。我们希望，不要因台湾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2]时就声明过，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继续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期限。我们同意了这一点。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请美国人撤离台湾，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在我们看来，就让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我们都能容忍。

**H.C.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宴会上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被拘禁在中国的 5 名美国人，他们中国人也不同意释放。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人离开美国，他们不会阻拦。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同德国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也是根据以金日成、我们为一方，以美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确定的。越南是按照日内瓦协定[3]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H.C.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他们自己则是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H.C.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走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曾经从苏联被分离出去的事实，则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外国干涉。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H.C.赫鲁晓夫**：不应这样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照美国人的要求做，也就是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人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 1955 年 3 月就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把同美国的关系与同蒋介石的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

（根据苏联方面的谈话记录稿摘录刊印）

**注释**

[1] 艾森豪威尔，见本卷第 46 页注释[29]。

[2] 万隆会议，见本卷《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注释[1]。

[3] 1954 年 4 月 26 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和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 23 个国家。7 月 21 日，与会国达成协议，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会议最后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 同安东诺夫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

按照指示，我[1]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情报。在交给毛泽东这份情报文本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这一外交做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情报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份情报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面。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H.C.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200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一支这样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三军。毛泽东继续说，在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关于苏联裁军决议的做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H.C.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H.C.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和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10-20年，甚至30-40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年（1918-1940年）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 1958 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于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來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议。”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 12000 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 600-7000 人。大约有 5000 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 80%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大。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日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

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姆（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根据安东诺夫的记录稿摘录刊印）

**注释**

［1］即安东诺夫，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5]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

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6]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7]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 注释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 孟什维克，是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派别。

[3] 波立特（一八九〇——一九六〇），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

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

[5]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

[6] 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7]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吴冷西[1]同志：

此件[2]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

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注释**

[1] 吴冷西，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2] 天津市畜牧局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整理的这篇文章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一九五八年以来，他们不甘贫困，分析了粪少、地坏、打不出粮食的原因，下定决心多养猪。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统一领导，全面安排，采取“男女老少，人人动手，谁打归谁，多余出售，队里不足，现款收购”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大干一年翻了身。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这篇文章和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后来载于新华通讯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上。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列批注与谈话，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以教科书原文为根据，通过一系列谈话和评论，真正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指导意义相当巨大。

## 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来说，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像列宁、斯大林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因为印度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在 1905 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无产阶级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在 1911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 1905—1917 年，那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了 1924 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一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

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主席评论说，华东协作区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个转变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使社有制经济的收入占到全社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因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不多，每年的收入大部分是分给社员消费掉了。一般说来，按每年的总收入计算，分给社员的约占百分之五六十，用于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缴纳给国家的占百分之七八，能够积累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会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我们有极少数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以后，还坚持了基本社有制，这些社可能在若干年内就要遇到如何处理从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的问题。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墓碑，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以后，六〇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就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 1917 年 7 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入无产阶级手里已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

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教科书说："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革命。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2]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333 页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确切。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

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333 页），这个说法不完全。不仅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书中这里还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说的不完全。没有说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的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纪。在农村来说，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她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人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

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3]。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

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力分，这也是经过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们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它人按劳力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土地应该怎样分法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 读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教科书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在读到教科书说“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

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时，毛泽东说: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教科书说“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引述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4]。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政权初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时，毛泽东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中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国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是应该用集体的社会力量来搞。不应该靠个人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有人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注意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像样子！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毛泽东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他还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相对地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十年一共投资 22 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 2 亿多元。它原有工人 50 多万人，除了调出几十万工人外，现在全市有工人一百多万人，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问题更加尖锐。书上这段话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

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做到高速度呢？

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斯大林对农民总是不放心，把农民卡得死死的，用拖拉机站来控制农民，结果吃了亏。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读到教科书说“过去中欧和东南欧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成为拥有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的工农业国”时，毛泽东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末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工业化的政策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却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时，毛泽东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时，毛泽东说：“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在读第二十一章时，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还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的人，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乐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进行抵抗。广东在农村中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 读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

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时，毛泽东说：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瞥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教科书说：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对最后一句话，毛泽东批注："完全不对。"

## 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在它的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娥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新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质变。

人从出生到死之前，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是量变的过程，也有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的生长，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量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的规模和外形都没有变，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同样有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

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在读到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时，毛泽东说：*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吗？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还是用常规武器的。即使在两个阵营之间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可能打，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

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这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九岁和九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时，毛泽东说：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的妇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批注：“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一九三六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在读完整个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针对这一段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少数人手里，那么全国绝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

电影掌握在钟惦棐这些人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又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人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在读教科书这一章的“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这一节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时，毛泽东说：这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段落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追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5]，以及“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6]。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

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同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备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读到教科书说只有在技术改造方面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时，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教科书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 读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那几个自然段时，毛泽东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讲机械化的最高阶段是生产的自动化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

在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原子能是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顶峰。苏联是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时，毛泽东说：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在读到教科书说“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时，毛泽东说：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的观点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说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现在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以

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教科书就是看不到事情的发展。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

440 页上把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平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住宅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转化而来的。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赡养老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时，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统治，苏维埃国家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执行经济组织的职能。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教科书说列宁的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集中领导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结合”。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时，毛泽东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妨碍迅速发展生产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读到教科书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里大动力”时，毛泽东说：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 读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在读到教科书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时，毛泽东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说：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时，毛泽东说：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 读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经过经济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人的计划都是合乎规律的，一定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是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就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

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九十三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十七点五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批注：“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教科书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还必须估计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处，毛泽东批注：“不搞关门主义，是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时，毛泽东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

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人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对教科书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计划领导的过分集中，不充分了解和考虑地方条件和可能性而企图由中央编制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以及对待计划工作的狭隘本位主义，都会造成各种错误，束缚地方的主动性"这一段，毛泽东批注："批评得好。"

教科书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方面的权力"。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有个好处，把地方分权写进去了。"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常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发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的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上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目前我国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的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教科书没有充分运用辩证法，对各个问题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将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高速度发展同美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经济危机进行对比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找一

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现在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读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

*在读完前六段后，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有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力的技术装置，有助于使纺纱、织布、印染得到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

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泽东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7]处，毛泽东批注：“对。”

在读完教科书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在读到教科书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时，毛泽东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

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

毛泽东还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毛泽东批注：“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列宁奖金”时，毛泽东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 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届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

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毛泽东批注："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毛泽东批注："这样就有奔头了，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教科书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毛泽东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 读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教科书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愈高，工资的水平也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当超过工资的增长。"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苏联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日用品零售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这两段时，毛泽东说: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毛泽东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8]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教科书说“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毛泽东批注：“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 读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

教科书说，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重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纯收人就转人按这种比较低的价格买得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在消费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末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 读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

教科书说：“一九五六年，国营谷物农场的谷物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七十以上。国营农场供应国家大量农产品。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在国家收购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肉类约百分之二十一，奶类约百分之二十一，羊毛约百分之二十七。”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可惜这里没有写上苏联从国营农场中得到的谷物，占全部收购谷物的比重是多少。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时，毛泽东说：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肯定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的说法。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五三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为加强物质刺激而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时，毛泽东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

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

教科书说："为了集体农庄和庄员更加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成果，各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采购价格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税率降低了。"毛泽东批注："有此必要。"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哪些部分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在读到教科书说"小型集体农庄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而且它们不能全面地发展公共经济"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道理，讲得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级差地租时，毛泽东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寒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 读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

教科书说，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所以就创造了价值"。毛泽东批注："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在读完第三十二章后，毛泽东说：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 读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

教科书说："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

在读完第三十三章后，毛泽东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 读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教科书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毛泽东批注：“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毛泽东批注：“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读完第三十四章后，毛泽东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读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教科书讲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毛泽东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技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毛泽东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9]，《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10]那里去。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

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各国家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一一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教科书说：“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设想，很好。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很好。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只讲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不讲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经过什么步骤、什么过程变成为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

他们不同意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前一种过渡，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国家的农业工人，由国家发工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没有适当的步骤，又可能刮起“共产风”来。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了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 读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批注：“赞成。”

在读到教科书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时，毛泽东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教科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九五〇年苏联按优惠条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时，毛泽东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读《结束语》**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

在读《结束语》时，毛泽东还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总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本

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文章写得很乱，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是从"人都要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这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原理、原则。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完备？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

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 补充

### 一、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215 页），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另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大工业消灭着资本主义因素，而小农经济却经常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归根到底是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从此逻辑地推论下去，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长期不克服，也有问题。最近辽宁省委的调查，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意见，都提出了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队所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苏联两种所有制长期同时并存，但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个矛盾。德国有个老共产党员，看了我们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很高兴，认为我们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远景规划。

## 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15、216 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长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的观点时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216 页）关于在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 四、将来我们的农村是一切国有化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第 241 页）关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观点时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把公社化错看为国有化，不少地方发生农民把土地推给人家，自己情愿少种的现象。经过整顿，经过三级所有制的确定，农民已经看清楚人民公社还不是国有，而是队基本所有，现在农民转过来多要土地，多种土地了。估计展开机械化以后，到处更会感到土地不足，会普遍进行改良坏土地。

## 五、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书 327—328 页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说法都很好，是应该这样说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说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说它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总是要来的。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327 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

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328 页）。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 六、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329 页）这个提法好。在 1848 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 110 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上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329 页）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18 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19 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 世纪初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二十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教科书说：“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联盟”（329 页）。

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在革命开始时，中农总是动摇的，他要看一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才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

334 页上说，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但是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其实质并没有多大区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想闹事，但闹不起来。这种形式好像与苏维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等。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代表。那时（指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

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 八、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把知识看成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科学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将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 九、中国农民问题

我国土地改革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曾经认为这种情况不好，其实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这是一种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中的优势。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339 页），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导致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书中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之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些。历次运动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份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 50％完全拥护公社，没有动摇；35％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 15％的队或者反对，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发生严重动摇和反对，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队的领导权被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

339 页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政府没收，然后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分，这是一种恩赐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作法，那就是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联，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

书上说（340 页）：“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两重性的。”对这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来说，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点比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历来他们对于合作化有抵触。

## 十、关于战争与革命

教科书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352——354 页），又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没有经过国内战争”。应当说，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的，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合而为一的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苏联红军

的铁犁犁掉的。说这些国家没有国内战争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的说法。

教科书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其实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完全不同。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我们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样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以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书上说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57页）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 1927 年起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 22 年延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 1911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 15 年的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混战。如果从 1911 年算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连续进行了 40 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成立之后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 30 年。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 十一、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工党走。

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353 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 19 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 十二、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吗？

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364 页）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成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

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 十三、列宁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教科书（375 页）引用列宁的一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作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行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 十四、教科书不讲内部矛盾

397 页上说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情况的叙述，都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和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

402 页上说："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地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 十五、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440 页上说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接着 441 页上承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矛盾，很好。但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得到逐步的解决，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是一二年整一次风，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 十六、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486 页上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的"一切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他的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486 页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部分人，绝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得很对。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书中这段说到较为勤勉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的条件下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于政治觉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觉悟低些。后一种人觉悟高些。

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革命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使人民有此觉悟。教科书上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

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而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内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了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了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或者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很大意义。

## 十七、社会主义各国发展能够“拉平”吗？

教科书660页第三段：“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毛主席说：各国人口不同，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省的卫生来说，佛山市和岐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市和广州不平衡。岐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 十八、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704页），随着从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过渡，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城乡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间的界限也将最终消灭。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因为那时候生产资料和全部国民财富的所有者是没有阶级差别的人民。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 十九、共产主义要求更严格的劳动纪律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706页）随着共产主义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成多余的了。货币也就不需要了。产品将按社会成员的需要直接分配。社会将逐渐用工作时间直接计算劳动，而不再采用价值和价值的形式。广泛利用电子计算机。

毛主席评论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 二十、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739页），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 二十一、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强我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来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大而强，但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人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一个梯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它梯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敌守我攻，加上他到一个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部分敌人。

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 注释

[1]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2] 见列宁 1917 年 11 月 4 日〔17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

[3] 见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4] 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5] 见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姆提出的问题》。

[6] 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7]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

[8]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3 版增订本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大的、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并不取决于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包括在工资以内，也就是说，是免费分配。”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免费分配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中将逐渐提高。”

[9] 指王若水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一文。

[10] 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

#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 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 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1953 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

1954 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1956 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2]。

1957 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 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 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 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1]

同年，1959，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3]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注释**

[1]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加到彭德怀同志头上的“里通外国”等罪名。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

[3]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

# 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 一 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的批语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1]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2]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港、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 二 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同志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若干情况的报告写的批语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

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 泽 东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全国总工会党组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最近全总召集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七个城市和辽宁省总工会管生产的同志，座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感到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预示着我国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保证了今年一月份的开门红，为实现全年的跃进计划奠定了基础。目前，各市党委根据已有经验订出了今年的初步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均有大幅度提高，看来今年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奇迹的一年。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职工群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将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更加拥护和贯彻总路线。把这一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即向自动化半自动化方向迈进，将迅速改变我国技术落后的面貌。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材料问题。所需材料主要靠自力更生，节约代用，不能占用生产材料。（二）企业管理问题。在劳动组织、技术供应和设计、机械维修、规章制度等方面需要作相应改革，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三）工人教育问题。生产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后，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文化技术水平，需要进行教育，以适应新技术的需要。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2] 这篇原题为《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的材料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初步获得大面积丰收。具体表现在：1．运动大大推动了当前生产。二月份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绝大部分超额完成计划，很多企业提前完成一季度计划。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成批地涌现出来。2．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劳动力大量节省。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因此，他们把技术革命称为“第二次解放”。3．为原料、材料大量节约开辟了途径。4．职工精神面貌也在起变化。许多工人日夜奋战，不计报酬，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和共产主义风格。目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全民性的群众运动，预计今年上半年大中城市的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基本上可以摆脱笨重的体力劳动，到年底基本上可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材料。

# 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1]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2]，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3]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4]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5]，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释**

[1] 指中共鞍山市委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一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给辽宁省委转报中央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

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的人很广泛，进展很快；二是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二）两个多月来所取得的初步经验。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三）鞍山地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要力争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目前，鞍山地区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四）加强党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总结工作，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其次，各级领导要改进工作方法，应抽出时间来学习和务虚，以虚带实。要切实精简会议，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生产第一线。要抓两头带中间，除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不断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再次，要大抓技术表演竞赛，同时还要不断搞文化革命，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等，迅速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运动中，要关心职工生活，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

[2]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3] 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

[4] 这里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指中共鞍山市委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群众运动情况和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毛泽东于当年七月三十一日将这一报告批发给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 关于反华问题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关于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给外交部、外贸部并贸促会的报告和记者屠培林写的通讯的批语。

附件[1]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的。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

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

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释**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月十四日的报告说，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自二月九日开幕，到今天观众已达五十万人，不仅轰动了整个达卡城，连东巴其他城市及达卡周围的农村都卷入了参观中国馆的热潮。从留言簿和同观众交谈的情况来看，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有百分之一多一点的人，在称颂之余抱有若干怀疑，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我国这次参加展出，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造谣污蔑，促进了中巴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屠培林写的通讯说，二月二十九日，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八十一天来，这里经常是人似潮涌。尽管印度某些反动分子在中国馆开幕前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破坏活动，可是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印友谊，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加以破坏的。八十一天里有三百多万印度各阶层人民到中国馆参观这一铁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 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释**

[1] 指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这期简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关于过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有的公社干部存在急于过渡的苗头，有的打算明年“走到社有制”，有的打算“秋后搞过渡”；2．穷队盼过渡，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3．对过渡的根据和一些问题的政策界限认识不清。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

对于一平二调，社干部与队干部有不同看法。例如队干部批评公社无偿上调物资，公社干部却有抵触情绪顾虑算账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存在虚报浮夸现象；有的地方用大量生产资金和物料搞盖大礼堂、办公大楼和宾馆等非生产性建设；干部中存在吃喝浪费和贪污行为。

[2]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3]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4]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 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1]，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2]。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3]。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

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4]，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　　央

1960 年 3 月 30 日

**注释**

[1] 指毛泽东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二期的批语。

[2] 指中共历城县委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四日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的指示给济南市委并报山东省委的报告。其中讲到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个部门的干部，既要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去就地商量解决，而不要把人召集到机关里开会。

[3] 山东省委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将历城县委的报告转发全省各地市县委，人民公社党委及省委各部委、厅局各党组，指出历城县委的四条措施都是可行的，各地应一律仿照执行。

[4] 指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 接见非洲外宾时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们。他们实际上统治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成一种很贫穷的状况，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可是蒋介石只有十万吨钢，比利时那么小的国家，就有三百万吨钢，所以我们很穷。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我们就打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譬如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不行，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说我们是有色人种，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的，很脏的，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差不多，似乎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的地位相同。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他们杀人，或者经过他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他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国人，怕帝国主义，怕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譬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美国人，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不怕了，跟他们的走狗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手里学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得出结论，我们说，可以。一个人压迫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胜利？！我们的敌人有强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他们的武器很强大，他们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他的武器，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空军。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有的是步枪、轻炮。这些东西是那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送给我们，我们就有了枪炮了。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了，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占领了大陆。他们的空军每天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害怕我们了，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们了。后来蒋介石也怕我们，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办法，还有别的办法。你们在座的有些国家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

友们也是这样看，是不是真的？（几内亚的外宾说：是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它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也捉不到。（全场活跃）因为它管的太宽了。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太多了。你看，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要控制欧洲，还要控制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这几天情形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1]。李承晚是美国的走狗，是一个老走狗。（笑声）南朝鲜人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群众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支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选择了新的走狗许政。他们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的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又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正在起来。今天是七号，后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2]政府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你们可能有人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他们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他的走狗。但是请你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也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3]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人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个大国，只有六百万人。离美国那么近，人口只有六百万人，巴蒂斯塔在六百万中间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4]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小船，到古巴登陆。开头第一仗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隐藏起来。然后又进来，一下子打了两年半，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看，古巴人民也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是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他，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们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都欢迎古巴的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我们认为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此，我们有义务要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也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就好走，可以站起来，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

来，反对压迫者。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例子。例如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它只有那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又牵制着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我们说这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他们在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这些事情，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一条腿，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些意见，也许你们不一定赞成。我们是交换意见的性质。请你们讲一讲好不好？你们的情形和意见我很愿意听。

（索马利兰的朋友讲到争取独立的情形时）谢谢。祝贺你们所有的爱国者，祝贺你们的胜利。你们一定会胜利的，哪有不胜利的道理？

（马达加斯加的朋友讲到争取独立的情况时）总有一天，你们会完全独立的。

（喀麦隆的青年代表：我们赞成主席所说的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但是实行起来我们有些怀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从来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们举行各种会议都不过是一些阴谋。我看首脑会议这一条腿，是一条有病的腿；还是另一条腿比较健全，更为重要，那就是反殖民主义那一条腿。）

讲的对，我属于你一派。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怀疑的，因为他老欺骗。但为什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暴露它哪一条腿有病。（全场活跃）

（阿尔及利亚工会代表在发言中说要和平共处必须排除殖民主义时）对，有殖民主义怎么共处啊？

（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了对法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决心，并说：法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强大的壁垒，要想窒息我们，我们只有要求朋友帮助，我们不需要人力，而是需要物资帮助，这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特征，希望毛主席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再讲几句。我赞成这位朋友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困难。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是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还犯了几次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曾经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力量原来有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还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得到机会，又发展到一百万人，这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面，而是用帮助的办法支持蒋介石，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它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十个战役，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变为优势，蒋介石变为劣势，大部分军队被我们消灭，我们占领了沈阳、北京、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占领，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京。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讲，

老百姓不相信，似乎蒋介石爱好和平，似乎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我们讲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代表签了字，派人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蒋介石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过去了。（全场活跃）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它。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譬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要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揭露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爱和平。帝国主义哪里爱和平？他们爱好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二亿人口中还有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作工作。有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完全破除迷信，站起来，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觉得我们不行，他们西方世界很行。他们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都可以干，而且还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而且白种人并不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他们会觉悟起来的。这就是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劳动者，农民。真正怕原子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也怕，他们几个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有机可乘。他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并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了一个、二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了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譬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赶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还有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起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年十四日伊拉克革命，一九五七年苏彝士运河战争，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起来日本人民也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们认为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高兴的方面看不见，你说美国人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还有英国、法国，还有什么比利时，阿登纳，还有日本政府。中国有一句俗语：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在战略上讲。在战术上讲呢？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重视它，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做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

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注释**

[1] 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2] 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〇年六月任日本内阁首相。他在任期内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3] 巴蒂斯塔(一九〇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一九五九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4]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 年 8 月 13 日-2016 年 11 月 25 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九五三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一九五九年一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 十年总结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1]，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2]。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3]，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4]，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5]，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6]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7]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8]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9]规定指标为一三〇〇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0]，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

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11]规定后三年[12]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3]，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14]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

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15]，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

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

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

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　泽　东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注释**

[1]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2] 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3] 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4] 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5]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6] 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7]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8] 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9] 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0] 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1] 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 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3] 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4] 指原准备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5]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注释**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随报告附送的沔阳县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的报告和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的材料。

[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1]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2]，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3]。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释**

[1] 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2] 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见本卷《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3] 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 293 页注释[1]。

#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1]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2]。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3]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4]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

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5]，十四句话[6]，也搞了六条指示[7]，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9]，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0]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注释**

[1] 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2] 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 293 页注释[1]。

[3]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4] 李世民，即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六二六年至六四九年在位。
[5]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6] 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
[7] 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卷第 299 页《党内通信》。
[8] 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9] 指《郑州会议记录》。
[10]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有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太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有许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了底。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在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

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我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抽人下去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搞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

第一条是情况明。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底，哇里哇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

第二条是决心大。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两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是不行的。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话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就不大，不那么容易。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差一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1]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变得不彻底，再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

第三条是方法对。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作调查研究比较认真，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2]，有麻城的经验[3]，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4]，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5]还早嘛。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那也是了，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不够彻底。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去吧。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一九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有个材料说：美国一个农民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很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

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注释**

[1] 五九年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3] 指王延春同志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数份报告。二十七日的报告中谈到，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三十日的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4]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5] 即本卷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 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

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

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

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 240 亿斤粮食，硬说有 450 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五十五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

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的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几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

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 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一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1]，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3]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4]，武昌会议的决议[5]，郑州会议的记录[6]，上海会议十八条[7]，我写给生产队、

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8]。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 二 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讲解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9]。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10]。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11]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12]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

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13]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14]，当时立三路线[15]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16]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17]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

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8]。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19]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20]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21]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22]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

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23]，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24]上，凯丰[25]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

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 注释

[1]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五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一篇文章《调查工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同志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2] 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4] 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5]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6] 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7]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8] 见《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卷第 299 页）。

[9]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

[10]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会议开了三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11]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 刘安恭（一八九九——一九二九），四川永川人。一九二九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

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13] 《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14]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5]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订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6] 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7] 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同志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 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

[20] 指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1] 指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22] 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3] 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出版的中译本，曾有将书名译为《帝国主义论》的。

[24]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5]　　凯丰，即何克全（一九〇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　泽　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1]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2]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

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3]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做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

批评这种方法。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

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

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5]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

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6]。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7]。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

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8]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9]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

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10]，工业企业七十条[11]，高等教育六十条[12]，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13]，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14]。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15]。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16]。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

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7]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18]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19]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20]，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21]，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22]，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

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

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注释**

[1] 这个讲话原有五处提到刘少奇的名字，一九七八年七月公开发表时均删去，现在按原样恢复。

[2]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3]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4]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5]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6]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7]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8] 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9] 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10]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1]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1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13]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14]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5]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16]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17]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18] 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19] 陈独秀，见本卷《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注释[4]。

[20] 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21]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一九六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

刑。“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在未发现任何新问题的情况下，于一九七〇年报经当时中央批准，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并加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未办理改判手续）。一九八二年，中央决定：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22] 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 从现在起要年年讲阶级斗争

##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1]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2]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

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〇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少奇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维汉[3]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4]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指对敌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5]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未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6]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

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注释**

[1] 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蒋村人。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3]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4] 王耀武（1904-1968），字佐民，汉族，山东泰安人。抗日革命家、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国民党著名特工，中华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杨虎（1889—1966），字啸天，安徽省宁国县人。1949 年拒赴台湾，留居上海，后寓居北京，并在 6 月初发表声明拥护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顾问。1958 年与台湾特务联系企图策动反共叛乱，事发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准予监外执行。

[5] 见本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1]。

[6]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引用了这句话，在《决定》中这句话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1]，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

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注释**

[1] 这七个材料是：（一）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二）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应四官是中共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支部书记；（三）章轶仲写的中共金华县汤溪公社汤溪大队支部书记、老劳模陈双田访问记《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四）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严如湛是中共桐庐县俞赵公社俞家大队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五）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六）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七）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而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认识问题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1]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思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雷锋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颐、程灏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地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地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

三、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五点：

1．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人家族的。

2．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3．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

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四、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以等一等嘛！

5．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

（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五、方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1．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3．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井泉）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哇？

5．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渭清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 注释

[1] 王延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7]。

#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比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1]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一九六〇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2]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

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

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注释**

[1] 三K党是美国历史长久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一八六六年五月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主要活动是散布种族主义思想，经常使用私刑、绑架和集体屠杀等手段迫害黑人和进步人士。它是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2] 肯尼迪，当时任美国总统。

#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最近，南越吴庭艳[1]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2]，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3]。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4]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5]，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6]，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注释**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2]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越南南方顺化市约两万名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集团禁止举行佛祀仪式，进行游行示威，遭到当局武装镇压，当场被打死十二人，伤十七人。六月十一日，西贡市七十多岁高僧广德法师为抗议当局对佛教徒的迫害而焚身自杀。六月十六日，西贡堤岸七十万市民不顾当局的镇压，为广德法师举行葬礼。此后，又有四名僧尼焚身自杀。这次从佛教徒开始的斗争，很快扩大为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斗争。吴庭艳集团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八月二十日，南越当局宣布全国戒严，继续逮捕佛教徒和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从而激起了各阶层群众更广泛的抗议行动。

[3]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关于越南形势的声明。声明指出，吴庭艳集团焚烧寺院、迫害僧尼、封闭学校、大批逮捕教员和学生的野蛮罪行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号召在南方的同胞，不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还是商人，也不分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坚决斗争。声明要求美帝国主义者撤出越南南方，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有力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4] 李承晚，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一九六〇年四月，南朝鲜爆发“四月人民起义”。他在南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于四月二十六日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5]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6]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美国违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并于一九六〇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 谦虚——戒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自己所管的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地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学习，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的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或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屡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因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很多人都很少认真地运用这个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抗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使人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

“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是一个真理。

（一）骄傲自满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产生和滋长。但是一般说来，通常在胜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产生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因为当处在困难的时候，一般是容易看到自己的弱点，也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客观上的困难摆在面前，不虚心谨慎也不行。可是每当胜利的时候，由于有人感谢，有人赞扬，甚至过去的敌人也会掉过脸来奉承一番，阿谀一番，因而就容易为胜利的环境冲昏头脑，而全身轻飘飘起来，真以为“天下从此定矣。”我们党深深地懂得，越是在胜利的时候，骄傲自满的细菌就越是容易袭击党。

（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一类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产生的，那就是胜利冲昏头脑，自以为了不起；另一类是在无特殊胜利，亦无特殊失败的平常情况下产生的，他们经常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安慰自己，并原谅自己的不进步，他们还

善于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等等来自我陶醉；再一类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即虽然已经落后了，也还是骄傲。他们认为“我们工作虽然没有做好，比过去总是好多了”，“某某同志或某某单位还不如我们呢！”他们每每炫耀自己的历史，三句话不到就是“想当年……”讲起来眉飞色舞。

（三）只要我们稍微忽视一下群众的力量，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眼界狭隘一些，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稍微把成绩估计得高了一些，把缺点估计得低一些，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就会骄傲起来。

（四）骄傲自满的情绪，从本质上说，乃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引伸出来的，同时它又培养和滋长了个人主义，因而骄傲自满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

（五）就阶级根源来分析，骄傲自满基本上是剥削阶级思想，其次则是小生产者的思想。

（六）小生产者就其本身是劳动者一面而言，他们是具有很多优点的。他们勤劳朴实，刻苦谨慎和实事求是。但是就其本身是小私有者一面而言，则他们是个人主义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方式是落后的生产工具，分散经营，眼界不广，见闻不多。因此，他们往往看不到集体的力量，而只是看到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容易满足，当他们取得一点微小的成绩以后，就产生“这个不错了”，“这也到顶了”，“该享享福了”以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这一类思想。

（七）骄傲自满是在资产阶级唯心世界观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使人在看待周围客观事物时经常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把人们引向失败的道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证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可是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夸大个人的作用，居功自傲，而忽视、低估群众的力量。

（八）因此，骄傲自满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

（九）骄傲自满的人往往不能忘情于自己的许多优点。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许多缺点掩盖起来，而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别人的许多优点抹煞掉。他们经常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相比，从而私自窃喜，看到人的优点则又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个啥”。

（十）事实上，把自己估计得越高，所得的结果就越坏。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幽默地说过：“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

（十一）谦虚，它是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应有的美德。因为谦虚对人民的事业有利，而骄傲自满却会把人民的事业引向失败。所以，谦虚也是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一种表现。

（十二）一个人要真正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工作者，必须做到下列两点：首先，他们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肯听群众的意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一员，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夸大自己的作用，实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这种精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就是谦虚的美德。

（十三）其次是他必须有不屈不挠、永远向前的精神，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新鲜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缜密的思考能力。因此他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胜不骄，败不馁，不贪天下之功，也不满足已有的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高贵的谦虚美德。

（十四）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的从工作中、生活中和其他实践斗争中去学习，经常总结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无情而坚定地和骄傲自满情绪作斗争，并且毫不保留地加以彻底的克服，那他是完全可以锻炼成为一个具有谦虚美德的人。

（十五）真正具有谦虚的高尚品德的人，他必须是满腔热情地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为集体的事业而忠诚不渝地积极工作的人。他之所以积极工作，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励和荣誉，不夹杂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要求在内，而是全心全意地为着给人民带来愉快与利益。因此，他总是埋头苦干地作着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利的工作，从不抛头露面，从不计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待遇，他不仅不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功勋和成就，而且在自己内心中也不让这些功勋和成就占地位，他全付精力所考虑的是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十六）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为什么必须要求自己具有谦虚的美德呢？

第一、因为他懂得，他的一切知识和成就的获得，虽然他自己也尽了一定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的努力，没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他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就不可能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他就认为不应该抹杀群众的功绩，不应该掠他人之美，贪别人之功。因而他觉得自高自大是可耻的。

第二、因为他懂得，他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所作的一些工作，在整个知识宝库里和整个革命的工作当中，仅仅是“沧海中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因为革命的知识和革命的工作，又是在不断发展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要用他宝贵的生命去最大限度的获得对人民有用的知识，最大限度的对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就觉得不应该固步自封，替自己关起进步的大门。

第三、因为他懂得，整个革命事业像一架大机器，是由大小各式轮盘、螺丝、钢架和其他机件紧密结合而构成的，谁也少不了谁，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觉得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一个人的成就，就像尊重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一样。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他就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紧密配合，他感到他离不开集体，他热爱自己的伙伴。因此，他便必然会用谦虚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而不会对任何人狂妄自大。

第四、因为他懂得，一个人的眼界往往是窄小的，能够看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革命知识和革命工作的范围却是极为广阔的，并且内容又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复杂的。因此，他便进一步懂得了任何人总难免会有若干缺点，会犯若干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常常不是自己全部及时觉察得到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为了要把革命工作搞好，为了对人民负责，他就得要求自己看得更深更广，要求能及时地发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迅速改正。因此他便要虚心恭谨地向别人学习和请教，他便要诚恳地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评。

由此可知，真正的从集体利益出发的人，是必须具备谦虚的精神的。而谦虚实质上就是高度的革命热情，强烈的群众观点，旺盛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集中反映。

（十七）克服骄傲自满和培养谦虚品质的另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这就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为什么？

（十八）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党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的亿万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

于个人，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是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真正深刻地理解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觉地谦虚起来。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狭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只能看到脚下，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就会像“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抬起头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化无穷，人类事业之雄伟浩壮，人才之多和知识之无极限，他便会谦虚起来。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业，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要看到整个的、长远的、全面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我们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帮助我们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因而就能帮助我们克服那种因小小成就、小小胜利而自满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而促使我们孜孜不倦、力求进步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唯心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十九）谦虚和自卑不是同义词，谦虚并不等于小视自己。因为谦虚本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视客观现实的进取精神的表现。而自卑却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缺乏自信力的、对困难采取畏缩的态度的表现。

自卑和自夸，自高自大，同样都是错误的，都是以主观主义为其思想垦础的，是对自己的两种极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的估计。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作用，因而他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他就不再前进了，他也不能及时地吸收什么新鲜的事物了，他于是就不可避免的要犯错误。那些自卑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和自高自大的人相反，但同样也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低，忘记了自己还可以努力提高自己，还可以从工作中锻炼自己，过分地降低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已经起的和可能起的作用。于是，便从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和自信。松懈了斗争意志。

总之，无论是自高自大或自卑，同样都是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都是非实事求是的非科学的态度，因而都是错误的，都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一类的习性，而且要严格地把谦虚与自卑的界限划分开来，免得由一个极端又倾向于另一个极端。

# 春节谈话

##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各同志的谈话，是毛泽东同志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炸，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整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蒋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把阎锡山的几千人消灭了。后来又打了邯郸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高树勋起义了，几千人没有跑多少。

**康生**：高树勋还是共产党员。

**主席**：可见人是会变化的。

我来介绍一下章士钊的历史吧。我们相识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在北大时。

**章士钊**：还早一点。

**主席**：那时我是个小职员，八块大洋一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当过黄兴的参谋长。袁世凯想提他当北大校长，就是陆平那个角色，他知道袁要做皇帝，不干，跑到日本。在日本出了个甲寅杂志，又叫老虎杂志，因为寅属虎。在日本出的比后来在国内出的好。回国后，与戴传贤唱对台戏，出了个杂志，封面划了个狗，屁股后面划了两条杠杠，表明“狗屁不通”。后来又当了教育总长，又参加了马厂誓师。

**章士钊**：我没参加。

**主席**：黄任老，你是个立宪派的人？

**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主席**：陈叔老你是研究系。许德珩，你这个水产部，很有前途，海岸线很长。无论是立宪派、革命派、研究系，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康生**：溥仪皇帝来拜年了。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他的叔叔载涛，听说生活很困难。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过去的陆军总长、军机大臣，留学过德国。可由你把稿费多给他一些，使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食无鱼”。

我现在不看《古文辞类纂》了，看《昭明文选》。《海赋》写得很好，庄子《秋水篇》很可以看一看。

国际形势，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输定了。现在还有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

好过，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了壁。波兰不大听话。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因为古巴没有石油，不能造武器，无可奈何。美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是要反美的，不仅日本共产党反美，日本人民反美，日本大资产阶级也要反美。不久前一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中法建交是戴高乐主动的，戴高乐还不是大资产阶级吗？他也反美。

（问章：）你知道沈崇事件吗？

**章士钊**：是沈从文吗？

**主席**：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人是要挨骂的，他们愈是骂我们，我们愈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愈是公开骂我们，我们愈好。最近蒋介石不大公开骂了。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说我们讲空话，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登我们的讲话？那就是说明我们有些东西。最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一）停止公开论战；（二）再派专家来；（三）边界谈判；（四）扩大贸易。来专家，你们敢不敢要呢？

**大家**：不敢领教，来了以后再走，反而增加困难。

**主席**：停止争论吗？他们骂了我们两千多篇，我们才写了七篇。边界谈判可以谈，在北京，二月二十五号就开始。生意也可以做一点，但不能太多，因为他们的机器一贵二笨。（他们一套化肥设备，一千八百吨重，要占三千多亩地，用三千多个工人。意大利的只有一百八十吨重，占三百亩地，用三百个工人就可以。）

**康生**：质量还差。

**主席**：是呀！质量差，还要留一手。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我们和他们作生意吃亏，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点商业道德。

过去几年缺点主要是两条，一条瞎指挥，一条高征购。现在都改了，可是又走到反面。瞎指挥改了，成了不指挥，下面没有劲了。还是要将他们鼓动起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石油部在大庆搞了一个大油田，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大。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大家不是要学解放军吗？要派人去学。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人民是工作队，解放军内部官兵关系好，比地方好。大庆文件要发给在座的。

（问蒋南翔：）大学是否要学解放军？

**蒋南翔**：要学，已派人去学。

**康生**：学校成立政治部，看来是肯定的。

**主席**：大学生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人民是工作队，积累了一套好经验，他们的工作比各地方、各部门都搞得好些，很值得学习。今年要把工作搞得比去年好些，错误要少些。在工作方法上，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要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在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好人好事、好的典型，应当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的典型，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今天开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的。国内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几个国家要和我们建交，一个是突尼斯，一个是布拉柴维尔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他们无枪无炮，用的是张飞的丈八长矛，关云长的

青龙偃月刀。

**邓小平**：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中国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叶挺一个团，南昌起义才搞了两个师，打到广东，搞得光光的。朱德、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那时教小学，教过一年级、二年级、三、四年级，怎样打仗，那时也不知道。

今年工作要比去年搞得好点，要想法把成绩搞得更好点。不但是中央的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今年也可能是较好的收成，如果老天爷帮忙。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教育也要改一改。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除中央的几位同志以外，还邀请几位党外人士参加，还有科学院长、教育部长、北大、清华的同志和新华社的同志参加。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请邓小平讲一讲。

**邓小平**：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负担太重，学制太长。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好的大学六年，要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毕业。加上大学毕业后一年劳动实习，一年见习，正式走到工作岗位就已经二十六、七岁，显得年纪太大了。比苏联要迟二、三年或三、四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三、四岁进入工作岗位。年龄大了，这对文科的学生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生，对他们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根据国外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等新兴科学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开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平均是二十四、五岁左右。这个年岁正好是脑子最好使的时候。而在我国的大学生，这时却没有走上工作岗位，这对他们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制特别长，应该缩短学制。

**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邓小平**：现在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准备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有同志提议：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五、六岁毕业就可以就业，也可以中学毕学后再受一、二年职业教育，十七、八岁就业，可以到农村，也可以到工厂。如果升学，可以入大学预科，预科可以文理分科，办得更有特色，便于同大学的课程衔接。大学一般搞四年，一部分的工科五年、医科六年。这样学制可以缩短，二十三、四岁就可以到工作岗位。采取这样的制度来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中学毕业生还不到当兵年龄，但可以到军队当预备兵。

**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指男的）也可以当兵。

**邓小平**：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课本要搞得好。

**主席**：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四大贤人。颜回二十四岁死了。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

**邓小平**：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功课得

五分也没有用。

**主席**：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邓小平**：现在课程繁重，考试方法有问题，学生不能独立思考。

**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去做。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出二十道题，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学生答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见解，这样的试卷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全部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的试卷就可以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自己不懂，问懂了就有收获。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总之，考试的方法要改变，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具体如何作法，可以试点。

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邓小平**：学制缩短以后，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参加劳动、当兵。还有一条，应该允许优秀的学生跳班，有的优秀学生跳班以后还是最优秀的，现在总是压在那里。

**主席**：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学生，害死人，要改变。

**陆定一**：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是学生负担太重，课程多，教材内容多，作业多，门门都有课外作业。第二是现在的教育方法有三套，学了苏联凯洛夫的一套，英美杜威的一套，孔夫子的一套。

**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书是书法，还是历史？是历史吧。如书经。

**陆定一**：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二是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很多房屋塌了，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入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主席**：这是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陆定一**：其他地方学生人数都下降很多，主要是要求正规化，取消复式教学，搞单式教学，贫下中农子女失学的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的经验。另外，广东新会

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麻烦得很。看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这样才能普及教育。从前都只是照抄苏联的一套，五八年冲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就是了。文艺也是如此，当时大胆改革，做得比较粗糙，但现在的水平就提高了。没有五八年的革新，也就没有今天的水平。

**主席**：要把演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市去，统统赶下乡去。要分期分批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你不下去，就不给开饭，下去了再开饭。住在城里怎么能写得出东西来！

**陆定一**：还有教师队伍问题，估计中小学百分之二点七的教师是坏分子。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

**主席**：这不要紧，只有百分之二点七。这些人可以改造，可以转业。

**陆定一**：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范，不要直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成了骨干。

**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陆定一**：小学改五年比较有把握。

**主席**：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汽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

**林×**：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陆定一**：现在教育思想有二派，一派主张讲深、讲透。一派主张讲总略，学懂、学会，学少一点。现在很多学校想一下子讲透。

**主席**：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四书、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现在都消化不了，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

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

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

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他和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一九六四年二月-一九六五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进入六十年代以来关于教育革命主要言论的汇编。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深刻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学生的摧残，提出了一系列教育革命的具体构想。

## 同毛远新[1]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二月）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懂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得，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提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对犯错误的青年，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没有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造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了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事，像你那样的青年人要多挨些骂，骂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如果现在让我写，我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我到哪里都想打听，都想交朋友，你们青年人要学辩证法，学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 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刘、邓、彭[2]阅后，请尚昆[3]办。此件[4]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　泽　东

1964年3月10日

## 要自学，靠自己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5]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

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都有用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主席：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蒋万岁。

主席：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Chiang（蒋）。

主席：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告诉我的。

主席：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主席：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主席：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主席：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它就是干部子弟，烈属子弟等。

主席：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主席：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主席：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主席：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主席：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

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主席：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主席：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主席：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主席：《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懂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句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杜甫有一首长诗叫《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

主席：在《唐诗别裁》上。（当时主席把书拿出来，把《北征》这首诗翻出来要我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主席：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

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主席：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没有。

主席：《聊斋》可以读。《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知识分子”英语怎么讲？

王：不知道。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又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主席：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字，只有“知识”这个词，没有“知识分子”。

主席：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送给主席）只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主席：你们学校那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这个字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主席：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主席：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做什么？

主席：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做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主席：假如敌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主席：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主席：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 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主席：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6]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厂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主席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主席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

主席：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

远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主席：（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远新又游出去了。）

远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没回来。

主席：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主席叫远新去学骑马，主席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主席：你会打枪吗？

远新：有四年没摸了。

主席：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谈到学院的工作，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说：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梡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止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的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止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

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览，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接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也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某些人的不正确影响。

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粱就是小米，菽就是豆子，黍就是黍子）。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

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众笑）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在要改革还有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

这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而我专门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都没有，比如说，拿工业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万了。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近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就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要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

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经济学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开始时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们要研究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设什么小说工厂。（笑声）文科要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的时候就不大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这里我讲的是形式逻辑。还有，比如学文学的要学语法，读的时候也不大懂。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习惯讲话的，不学语法也可以。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没有语法这门课的，但是古人的文章有些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语法。

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学什么修辞的。（对克伊腊克）你是先学了修辞学再写文章的吗？（笑声）

（克伊腊克：不，思想上得到启发，或者说有了“灵感”以后，就进行写作，而不是先学修辞学。）

我就是不理修辞学的。我看过修辞学，但是不理它。照修辞学上说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规戒律太多。

## 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陆定一[7]同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注释**

[1]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同志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这一期《群众反映》摘登了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一九六四年二月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来信。

[5] 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政治周报》，三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教员，十月底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6] 即本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7]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再次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时的谈话。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1]，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在等着看。“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2]、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注释**

[1] 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 “三自一包”是我国大跃进运动及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由大跃进初期的极“左”浮夸，转向极右走资的一个标志性方针。它就是：允许社员多留自留地、允许自由贸易、自负盈亏；大搞包产到户。

#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部分讲话。

一

我们要注意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那里只有一千几百万人口，还没有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能打仗，游击战争打得非常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一个省能不能打游击战争？我看各省都可以打。

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厂、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送去。每个省都有一、二、三线嘛！军工部署也要考虑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每个省，就是讲沿海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有黑龙江，那是对修正主义的，都要搞点地方的，属于地方所有的军工厂。现在地方不搞军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来怎么办？子弹、轻武器、炸药，武装民兵都不够。打起仗来，要搞地方部队，第一、二线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来，措手不及。第二线就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吉林、河南、山西、宁夏。敌人可以空降，但总是孤立的，到二、三线总是困难的。一打起仗来，准备打烂，准备丢掉城市，各省都要有办法。

光有武器，没有子弹、炸药怎么办？就是这一点，请你们各大区、各省注意。现在没事，打起仗来怎么办？将来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现在省、地、县委都不讲武了，只讲文了。

二

还有个问题，要搞第三线基地。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黄色炸药以大区为单位搞。

陆军不能像天安门检阅那样，靠装甲车运载，一是桥梁不行，二是公路不行。还是靠两条腿走路为主，靠马灯、手榴弹、骡马这些东西。

军事演习训练，在北京搞一次射击，请省委书记都来看一看。我也没看过，也去看一看。

#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部分讲话。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1]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2]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注释**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组织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彭，指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〇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1]，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2]，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3]，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4]。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5]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6]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7]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8]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

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9]，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0]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注释**

[1]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打击英国侵略军。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2] 指一九〇〇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入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3] 中日甲午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后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4］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5］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6］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7］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时指埃及。

［8］华盛顿，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9］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10］肯尼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

#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主席：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较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像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同时，另外讲一句相反的话：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那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港，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十二只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话。

主席：好。

佐佐木：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话。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跃进，为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主席：谢谢！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主席：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有一千一百多人[1]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主席：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话没讲完，请再讲。

佐佐木：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

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争。

主席：说得好！

佐佐木：这次我们来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2]、赵安博先生[3]以及其他中国朋友一起，就日中问题，就围绕日中问题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形势，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得到了教益，并且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促使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主席：这个好！

佐佐木：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群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它必须同关系很深的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中国把日本当作亚洲的一员，同我们进行合作。

主席：一定，互相合作。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因为的确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过珍珠港，曾经占领过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没有深入进去，打了败仗。日本军队在那里损失了二十万人。这样一个垄断资本让美帝国主义稳稳地骑往自己的头上，我就不相信。在这里，我不是赞成再轰炸珍珠港，（众笑）也不是赞成占领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当然，我也不赞成再去打朝鲜和中国了。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 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岂不好吗？

刚才你说到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还有朋友提问题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这是座谈会。你们不是有五个团体吗？

佐佐木：（对日本人说）各团出一个代表讲话吧！

黑田：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勿宁说是谈一谈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主席：好！

黑田：日中友好运动，开始时只有社会主义者和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参加。最近，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这是日中友好运动的变化、特征，也是一个前进，值得注意。从政党来说，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是革新政党（在日本革新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现在保守党中的一部分人也下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了。从国民的阶层来看，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者。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别是下决心搞日中贸易。

主席：我也知道，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田：保守党内和垄断资本中有一部分人也开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当然也有跟美国走的，因此在保守党和垄断资本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况。而且，这一部分垄断资本和保守党，不能和我们完全一样，这样要求他们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里就必须有斗争，那些没有决心向前看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保守党的背后，有美国的力量。美国在操纵他们。因此，同这部分反动的保守党和反动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和美国进行斗争。整个说来，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成了国民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有的表现出来，有的潜在着。这样一种感情是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对美国没有这种感情，对英国、苏联也没有这种感情，对中国却有特殊的感情。

主席：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场所）。有十五位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没有印度人。（会场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那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没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作这工作的，要停止公开争论。听说现在罗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

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外宾表示不赞成）

细迫：我曾经长期坐过监狱。像我这样善良的好人被关在监狱，对有病的妻

子，也不能照料。对这样恶劣的政府，我没有办法像主席那样宽大。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从神户坐中国的“燎原”号货轮来的。日本的友好团体租了小船，打旗、奏乐来欢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里转来转去，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我们来中国后，中国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欢迎中国朋友的国家。

主席：你们从上海登岸的？

细迫：是的。像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应当早日打倒，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否则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友好。我不能宽恕欺负我的政府。我年纪大了，想在我的遗嘱里告诉我的孩子，要他们打倒政府。

主席：多大年纪了？

细迫：六十七岁。

主席：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岁，所有帝国主义都垮台了。你们恨日本政府、日本的亲美派，跟我们过去恨国民党政府亲美派——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曾经和我们合作过，举行过北伐战争，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杀共产党，把几百万人的工会、几千万人的农会，一扫而光。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们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有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们自己犯错误，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

从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边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主席：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曾我：在三十个人当中，我们这一批人（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线活动的。我们很想了解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我们都是社会党的左派。我们同社会党中央的改良主义者、结构改革论[4]者进行斗争。

主席：你们有多少人？

曾我：全团十一人。从我们年青人看来，我们觉得社会党的干部、议员行动迟钝。也许因为他们年老。（主席插话：包括我在内了。）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请讲讲。

主席：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晓得要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功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

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约。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了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

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佐佐木：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对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谈话，谢谢。

主席：我讲了多久啊？两个多小时啦。

细迫：谢谢毛主席进行了富于教益的谈话。上次我随铃木茂三郎来时，毛主席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谚语："虽读论语，却不知论语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贤明，所以虽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们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过，听了主席的谈话，我想，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从我们周围许多教员那里学习。

主席：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它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5]。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没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没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没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热烈鼓掌）

## 注释

[1] 根据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在 1062 名日本战犯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分 3 批对关押的 1017 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至 1964 年，所有日本战犯被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国。

[2] 廖承志，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3] 赵安博，时任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
[4] 结构改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思潮。以陶里亚蒂（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为代表。主张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领导阶级”；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范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实现国民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宣扬无产阶级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5]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又称三国条约。1963 年 8 月 5 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此条约并未禁止地下核试验。

#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几个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1]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一段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狚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

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光美[2]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3]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4]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5]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6]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

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

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7]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8]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陆平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9]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

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

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我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

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注释**

[1]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2] 王光美，刘少奇之妻，时任刘少奇秘书。

[3] 周谷城（1898 年-1996 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60 年代初，展开了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 年至 1962 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

[4]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孙宝山、叶非木、勉之等，无锡玉祁镇人。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5] 邓子恢，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11]。

[6] 波格丹诺夫，见本卷第 47 页注释[51]。

[7] 章太炎，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15]。

[8] 傅鹰（1902 年 1 月 19 日-1979 年 9 月 7 日），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9] 艾思奇，见本卷第 48 页注释[61]。

#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谈话。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1]。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2]，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3]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4]没有讲清楚，墨子[5]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6]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7]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8]。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9]。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10]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11]，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12]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13]，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14]。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15]。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16]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17]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18]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19]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20]手里衰落的。康熙[21]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22]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 注释

[1] 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

[2] 见《庄子·天下》。

[3] 艾思奇（一九一〇——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4] 老子，相传即老聃，姓李名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庄子（约前三六九——前二八六），名周，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

[5] 墨子（约前四六八——前三七六），名翟，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

[6] 张载（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宋哲学家。李卓吾，名贽（一五二七——一六〇二），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王船山，即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哲学家。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7] “双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本篇中所说的那一段话，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审阅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文字的主要部分。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见本卷第 432 页。

[8] 这句话在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里。

[9] 星云假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一七五五年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10] 富兰克林（一七〇六——一七九〇），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11] 指《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郁之的文章《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

[12] 哥白尼，见本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0]。
[13] 伽利略，见本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0]。开普勒（一五七一——一六三〇），德国天文学家。著有《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4] 见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原词为："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15] 见张华《励志诗》。
[16]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在日本学医。
[17]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早年曾在日本学医。
[18] "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五反"，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19] 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名霑，字梦阮，满正白旗人，清代小说家。
[20] 雍正，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一六七八——一七三五），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五年在位，年号雍正。
[21] 康熙，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一六五四——一七二二），一六六一年至一七二二年在位，年号康熙。
[22] 指勒柏辛斯卡娅（一八七一——一九六三），苏联科学院院士、细胞学家。

#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是尖锐对立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同志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一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1]。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注

二

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毛注[2]

三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注[3]

四

这些人[4]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5]

**注释**

[1] 指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信中说的以下一段话：“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不断斗争的过程。而克服我们企业管理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是促进上述过程的前提条件。”

[2]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信中以下一段话之后：“这一次在这里，‘三同’实行得更认真一些。同吃，在厂职工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同劳动，固定岗位在总装工部第四小组，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并准备拜这个组的组长为师傅，学习装配修理拖拉机。”

[3]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信中以下一段话之后：“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因此，这次送上的报告，只讲到运动有关的一些情况。这封信，我也只说到到厂后若干感想。如有新情况和新问题，再给你写信报告。（只有把社教搞彻底了，才能搞好管理。这样抓是对的。——薄一波注）”

[4]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5]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中以下一段话之后：“从环绕底盘车间发现的上述七大严重问题看来，这个单位以至全厂有关‘五反’方面的斗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斗争也是极为复杂的。既要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之间的严重矛盾，又要解决存在于敌我之间的严重矛盾。这两种矛盾实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要彻底解决这两种矛盾，只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的指示，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大搞一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幻想采取改良式的或一般的改革办法，肯定地说是无济于事的，要想把我们的企业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更是办不到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有关社会主义企业建设上的根本问题认识不足，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着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等等右倾思想，在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这段话中提到的七大严重问题是：1．有一个和车间领导直接联系的贪污盗窃集团；2．浪费国家资财十分惊人；3．严重破坏工人的政治、经济民主权利；4．重用坏人，同坏人和平共处，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5．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十分严重；6．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7．暗藏敌人长期存在，活动猖狂。

# 同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斯诺[1]:我来这里见主席之前曾看了主席的军事著作，联系南越军事专家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南越战争[2]已经进入到运动战阶段，像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

毛泽东:我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起，那时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我们的军队也有一百多万。从规模上说，现在南越战争还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劝劝美国政府，何必这么搞?它一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人就学会打仗。但是，叫它走，它又不走。就说吴庭艳[3]吧，我和胡志明[4]都认为他还不错，应该帮他维持几年。可是美国将军认为吴庭艳很讨厌，把他干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斯:当然现在南越解放军的人力不如中国的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但是西贡[5]也没有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

毛:没有那么多，也不懂得打仗，比蒋介石更差。

斯:是不是可以认为，南越有足够的力量能单独克服外来的干涉和反对当地反动派?

毛:我看是可以的，至少比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候的条件好。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没有外国直接干涉。现在南越的好处就是有两万名美国人在那里，这就能教育大部分的人民和军队里的战士以及部分军官。现在反对美国军队的那些人，并不全是解放军，吴庭艳也不赞成美国，现政府军队中也有些人不赞成美国。

斯:很明显。

毛:他们吵得厉害。

斯:有可能使南越军队的一部分人参加越共?

毛:是的，像傅作义[6]一样，像新疆的陶峙岳[7]和湖南的程潜、陈明仁[8]一样。

斯:从我前次来中国后，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非洲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否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

毛:你说呢?我也不大清楚，我又没有到处走。你到处走，是怎么想的?我想请你当教员，把国际情况讲一讲。

斯:我相信主席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或者只好等主席的下一本书了。从主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席特别重视的那些事件，从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我看美国总统也是这么说的。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9]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

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现在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还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鲜呆得久。他会取得经验的。我已经看到美国军队怎么对付南越游击战争的条例，无非是讲南越游击战争的许多长处和许多缺点，然后说消灭游击队是有希望的。

斯:美国人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毛:可能是。就是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无论吴庭艳政府也好，当今政府也好，都是脱离群众的。帮助这种不得人心的政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仅我讲的话他们不听，你讲的话他们照样也不听。

斯:过去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认为他们才有那么多的失败。现在可以看到亚非拉同发达国家在军事、经济方面的距离越来越大，同时，新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使距离更大了。这是不是主要矛盾?所以法国的政策有改变，是不是不仅为了抵抗美国，还为了适应这个主要矛盾?

毛:我也同法国人讲过。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我问他们第三世界究竟包不包括法国，他们说不包括。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意、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它们为什么要打，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吗?你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你们前任总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任总统也参加了。

斯:那时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

毛:呆了多久?

斯:两年半。战争结束后，在英国、法国呆过。我从未打死过人，我倒有几次几乎被打死。

毛:那么危险!也跑到前线去?

斯:战地记者是战争的附属品。在俄国我没到过前线，在德国、法国到前线去过，打斯大林格勒时去过斯大林格勒。

毛:打前还是打后?

斯:希特勒[10]军队投降时去的。

毛:那时希特勒可了不起，差不多占领了整个欧洲。除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一线以东之外，整个欧洲几乎都被他占领了，但是英国不包括在内。他还占领了北非洲。希特勒犯了错误，如果敦刻尔克[11]之后他的军队跟着进去，英国也毫无办法。这是一位英国首相[12]在日内瓦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的。那时英国根本没有兵了，到处没有设防，可是就是因为有英吉利海峡，德国不敢过去。

斯:希特勒急于打俄国。关于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

毛: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

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斯:在延安时?

毛: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

斯: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斯:美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封建主义，南北战争[13]的原因之一就是反封建。

毛:就是为了争劳动力，所谓解放黑奴就是开放劳动力市场。

斯:美国南方封建主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毛:现在南方还比较落后一些。

斯: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主席一定会听到有人说，主席认为如果发生一场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

毛:你说怎么样?

斯:实际上已由主席间接回答了，在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文章里也提到了。

毛: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斯:我恐怕也忘了，不过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到，这是撒谎，是硬把这些话加到主席身上的。

毛:怎么说的?

斯: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口。这是一位南斯拉夫人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访问中国时，主席向他说的。

毛: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14]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他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听说你们有个电影叫《在海滩上》。

斯:那是假想小说，说全人类毁灭了。

毛:这怎么得了啊!赫鲁晓夫[15]说，他手里有一种弹，一种什么死光[16]，

可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统统消灭光，后来又说没有讲过，几次否认。我不否认我说过的话，你不要替我否认这个所谓谣言。

斯:我的书里也说主席也可能这么说的，目的是看看对方的反映怎样。

毛:这是因为有一位大国政治家说，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了，我反驳他的意见。

斯: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第一次提的?

毛:是的。这是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事。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最近看见报道说许多美国专家访问比基尼岛[17]，他们登陆后看到老鼠照样在跑来跑去，鱼照样在湖里游来游去，井水还能喝，植物茂盛，鸟类很多，专家在进岛时要开辟道路，砍掉树木。这是在这个岛经历过十二年的核武器爆炸试验，隔了六年再去的。爆炸之后大概有一两年生物是倒霉的，然后又生长起来。为什么老鼠根本不受影响，没有毁灭?因为它们钻到洞里去了。植物为什么那么多，不受影响?大概死了不少，剩下一点又生长起来，经过几年又大大发展起来。

斯:我看过一部电影，在氢弹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龟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龟。

毛:过几年可能又会生的。对人类是不是也这样，就不知道了。

斯:甲虫生命力最强。

毛:总之，对那地方的鸟、树、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可能人类要比它们脆弱一点。

斯:人对自己制造的毒素更易受灾。蚂蚁认为自己统治世界，它是世界之主。

毛:什么人在蚂蚁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蚂蚁还是比较大的动物。细菌是在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全世界只有这么多的人，三十多亿。但是据土壤学家告诉我，每亩地里含有细菌四百公斤。没有细菌不能造成土壤，也不能生长植物。所以不要看它那么小，什么人的身体里它都能钻进去，不管你是总统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它可厉害了。

斯:细菌根本看不见的。

毛:人离开它是不能生活的，不知人体中有多少细菌，医学上说，有大肠杆菌，口腔里有真菌，没有它对人很不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一致的意见。美国专家在比基尼岛的调查是很好的材料，我们把这个材料印发给人大代表看了。

斯:这是公开报告?

毛:不是，是一个中国人引用美国专家材料写的一篇通讯，那篇通讯登在香港的《新闻天地》上。

斯:虽然如此，主席并不是认为核战争是件好事?

毛: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斯:看来亚非拉地区越来越近代化，革命越来越发展。

毛:可能。

斯: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是不是可以在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完成?

毛:完成就难说了，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

斯: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问题，中国表示支持。这是否会为其他国家退出联合国开创先例?

毛:开先例的是美国。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印尼退出联合国，也是它觉

得参加联合国没有什么好处。

斯: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

毛:不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这些话你可不要报道，我们还没有公布过。

斯:是不是可能有一个没有美国的联合国?

毛:亚非会议[18]就没有美国参加。

斯:还有新兴力量运动会[19]。

毛: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我们这个“联合国”接待你，那个联合国还没有接待过你吧?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中国?

斯:再过几天就走。这次我回去，约翰逊[20]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

毛:没有。

斯:我也可以把这句话捎给他。

西方有些“毛学”专家，互相展开争辩，观点各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是一些什么人?出版商吗?

斯:主要是大学教授，俄文、中文专家。辩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21]小册子之前写的。

毛: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

斯:当时有时间做研究工作?

毛: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

斯:《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

毛:就是。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斯: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

毛: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斯: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

毛:先后不久。

斯: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吗?

毛:不是一九三八年，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斯: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些教授们，主席自己是怎么讲的。教授们在进行学术性辩论时，可能还坚持他们的看法。主席看过黑格尔[22]的文章吗?

毛:看过一些，还有费尔巴哈[23]的。海克尔写的一本书[24]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斯:什么时候读的?

毛:那很久了，是打游击战争的时候。

斯: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斯:一千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斯: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

毛: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资本家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你刚才说的最后这一点，很难讲。你讲有什么安全?现在不是在说裁军吗?究竟哪一年裁军了?不是讲普遍、彻底裁军吗?过去苏联讲，现在美国也讲，我们也赞成过普遍裁军。事实上，现在是普遍、彻底扩军。嘴里说普遍裁军，实际上普遍扩军。

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5]就是这样，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

斯:主席曾经说过，在江西打倒土豪劣绅时，他们说苏维埃先生是个很坏的家伙。而且在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西方都在讲社会主义先生制造很多麻烦，现在又归结于中国的原子弹。

毛:这证明我的“名誉”不好，中国政府、中国党的“名誉”都不大好。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中国，搞反华高潮?我们还措手不及，突然肯尼迪不见了。越南人民还措手不及，吴庭艳不见了。再一个措手不及，赫鲁晓夫下台了，真是天晓得，而且搞得那么彻底，他的书、照片一概收起来了。

斯:好多欧洲的党批评苏联党用这种办法把赫鲁晓夫搞下台。

毛: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曾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

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

毛: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美国常说，南越战争要扩大到北方。

毛:最近腊斯克[26]纠正了他的说法，说他没有讲过这种话。

斯:当然，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听我的话。美国有一位议员叫丘奇，他现在提出对美国干涉别国的政策要进行一次大辩论。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美国统治者不了解主席，我本人恐怕也不了解。

毛:怎么不了解?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

斯:打南越战争的美国人在说，如果美国撤出南越，中国将占领整个东南亚。

毛:怎么占领法?我们的军队去占领，还是当地人民去占领?中国人还是占领中国。

斯:中国在南越有没有军队?

毛:没有。

斯:腊斯克说，如果中国和北越放弃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美国就撤出南越。

毛: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斯:过去说中国受俄国支持，现在说南越受中国支持。

毛: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实际上，南越是从美国取得武器。去年以来，他们不仅能取得武器，还补充兵力，经常俘虏南越伪军。这同过去我们兵源之一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一经俘虏就能参加我军作战。

斯:为什么?

毛:他们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当兵的，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斯:还有一点，中共和全国老百姓是一致的。

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是贫苦农民。我们的办法是，花几天工夫开诉苦大会、祭灵大会，谁家有人被国民党害死，就把死者的名字写在纸上祭灵。这样解

决问题后，他们就参加了我们的军队，换上一顶帽子。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戴我们的帽子呢?因为他们怕打死了以后，被人错认为国民党的兵。从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认出来他们是我们的人了。

斯:在很大程度上，南越就是这种情况。

毛: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27]，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吧?

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很多革命家，提出的口号同后来法国大革命[28]提出的口号一样。那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当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毛:华盛顿[29]的“名誉”不好，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

斯:中共会把他看成是个反动的人，所以不会让他参加党。

毛:不能参加共产党是一件事，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30]也一样。

斯:林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也是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斯:主席能否给美国总统也提些建议?

毛:这不好提。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斯:美国军队差不多有一半在外国。看样子，好多在外国的美国军队变成了当地人民的人质。

毛: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这么一叫，例如打金门几炮，就是因为我们打那么几炮，它觉得第七舰队不够了，把第六舰队开过来一部分，把旧金山的海军也开一部分过来。我们又不打炮了，美国军队来了没事干，又要开回去。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

斯:美国军队总要有点事干才行。

毛:有事干的。美国垄断资本就要到有些地方去帮反动派的忙，叫它不帮不行，一定要帮，最后它一定要走，像帮助蒋介石一样。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31]问题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蒋介石总打败仗，又有强大的解放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呆着不走。

斯:只有在同样情况下美国才会从南越撤走?

毛:美国在南越的军队现在不走，可能再打一两年，但美国感到没有味道了，

走了也难说。

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周恩来总理的话，总理同我说，美国军队撤走前，不可能通过开会解决南越问题。是这样的吗?

毛:我不晓得总理怎么讲的，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或者根本不谈，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了美军还不走，像它在朝鲜那样。在日内瓦也是谈过的。日内瓦会议[32]后，美国把兵开进南越代替法国军队。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 注释

[1] 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

[2] 南越战争，即越南战争。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了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破坏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南方扶植建立以吴庭艳为总统的亲美的“越南共和国”。一九六一年，美国对南越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南越吴庭艳集团出人的“特种战争”，镇压越南南方军民的武装反抗。一九六五年初美国一面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连续轰炸，一面向越南南方增派大量军队，把侵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3] 吴庭艳，见本卷第465页注释[9]。

[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5] 西贡，这里指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其统治中心在西贡。

[6]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安昌村（今属临猗）人。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7] 陶峙岳（一八九二——一九八八），湖南宁乡人。曾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九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8] 程潜（一八八二一——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与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省长等职。陈明仁（一九〇三——一九七四），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八月与程潜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9] 肯尼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

[10] 希特勒，德国纳粹首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11] 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一海港城市。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军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侵入法国，击败英、法军队。英国远征军二十二万人、法军二十万人被迫退到比利时、法国沿海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四日，英军及部分法军共三十多万人从敦刻尔克地区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往英国。虽然撤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但保存了有生力量。

[12] 指艾登。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他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任英国首相。

[13] 南北战争，指美国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次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4] 尼赫鲁，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任印度总理。

[15] 赫鲁晓夫，原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16] 死光，即激光。

[17] 比基尼岛，是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个珊瑚岛，一九四七年成为美国托管地，曾经是美国的核试验基地。

[18] 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19] 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国家及地区参加的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余名运动员。

[20] 约翰逊，当时任美国总统。

[21] 指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毛泽东将其中的两节，整理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22] 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大师。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

[23] 费尔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德国古典哲学家，唯物主义的代表。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

[24] 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海克尔（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卓越代表之一。他在《宇宙之谜》一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试图根据最新的科学成就建立严整的唯物主义体系。

[2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宣布成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和西班牙分别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八二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26] 腊斯克，一九〇九年生，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7] 美国独立战争也称北美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28] 法国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在法国封建制度极端腐朽，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与广大的第三等级（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爆发的。这次革命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29] 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

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当选为总统。

[30] 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美国共和党人，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任美国总统。他领导了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了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

[31]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二百五十多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七月三十日夜紫石英号军舰逃出长江。

[32]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一九六五年五月）

*1965年5月21日-29日，时隔三十八年，七十二岁的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在当年革命烈火燃起的地方，领袖心怀执政党的崇高责任和人民群众的深切重托，结合我国和世界的现实，发表了这篇令人深省的重要谈话。

## 一 五月二十一日的谈话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而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一九二七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1]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你（张平化）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 二 五月二十三日的一段谈话

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 30 多倍，美国是 20 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

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 三 五月二十五日重要论断

你（张平化）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

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2]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注释**

[1] 萍浏醴起义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05 年湖南发生水灾，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1906 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 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起义军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

[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医务人员的谈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 反对折衷主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浙江省委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1]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2]，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

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3]，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4]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

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5]、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 注释

[1] 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2] 孙达人，浙江富阳人。1957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验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著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等。

[3] 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4] 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5] 杨献珍（1896 年-1992 年），湖北十堰人。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 第六卷后记

亲爱的同志们：

当你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润之赤旗版）已经告一段落了。这部选集是我二〇一八年一月末决定选编的，三天时间排出了目录，随后开始编辑，历时近一个月，完成了这部六十多万字革命著作的编排。本卷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卫生、教育各个领域，是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 一、关于本卷的编排情况

毛泽东同志革命著作集的缺失，是每个矢志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之人无不遗憾痛心、急求改变的。《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编辑，是早有前贤为之努力奋斗过的伟大事业。网络上主要有两个《毛选》第六卷的版本传播。一个是主人公网网友几年前编出的版本，这个版本的选稿起自一九五七年，止于一九六五年，还有两篇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重要著作，共收录著作八十八篇，流传最广。第二个版本是革命友人静火同志选编的，选稿起自一九五八年，止于一九六五年，共收录著作七十五篇。

这两个版本都有着自己的优点，系统、较为全面地收录了领袖的革命著作，是革命同志智慧、心血的结晶。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版本的《毛选》第六卷都存在着一点点白璧微瑕的小问题。例如，《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是毛泽东同志建国之后最重要的革命著作，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论》”，这部著作有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文集》版、万岁本版、《批注与谈话》原书版等，但内容最不全的就是《文集》版，而静火版第六卷恰恰使用了这个版本。主人公网版第六卷使用的是《批注与谈话（简本）》原书版。而鉴于这篇谈话的极端重要性，本书将六八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版本、《毛泽东年谱》中的版本和《批注与谈话》原书版三个版本综合整理，按照章节、页码、专题三种方法编排，成为此篇。《年谱》中的谈话总计三万八千多字、《万岁》本中的谈话原文有四万六千多字、《批注与谈话》原书版篇幅更长。本书中的这个整理稿总计五万一千多字，基本上保证了原谈话要点的完整收录。

用本人的话攻击本人是右派分子最狠毒的伎俩。毛泽东同志深谙唯物论、辩证法，时常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得出妙论。可是那些反革命右派分子，由于自己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断章取义、摘取毛泽东同志的只言片语，愚弄群众。作为曾被反毛分子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蒙蔽过的人，我对毛泽东同志著作言论的出处极端重视、反复查证。例如，曾经在网上传播很广的著作《论反对官僚主义》，经查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而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篇重要讲话，收于《周恩来选集》下卷，题为《反对官僚主义》。还有毛泽东同志论教育革命的几篇著作，本书坚决全文收入，以防反革命分子断章取义、混淆视听。毛泽东同志大跃进初期的大量重要讲话，本书绝大多数全文收入。关于那篇《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所谓“感谢日本侵略”问题，我根据万岁本原文录入这篇谈话，相信每个有基本正常人心智和理解力的朋友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那帮黑了心的反革命生物的谣言又是何等无稽。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还使用了《毛泽东博览》网站新推出的资料《毛泽东书信、言论选》（苏联解密档案部分），本卷收入了此书中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

安东诺夫和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的多次谈话纪要。

本书在收录文献时，凡不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或以其名义发表，而是以中央文件形式发表的（例如《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不独立成篇，而是收入“短篇指示汇编”一篇中。

万岁本中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在当时已经被打倒的人士，其名字一律用“××”代替。为了核证这些人名，笔者反复搜索查证，根据多个版本和原文的语境最终得出结论。如果不能确定人名，则绝不臆测。

这个版本是存在不足的。例如，很多文章中重复出现的人名，没有一一补记注释；万岁本中存在的少量错别字未能一一全部校正；可能有些主要著作未能发现收入；全书篇幅较长等等。希望同志们不吝赐教，多多提出指导意见。

## 二、几篇著作的核订问题

本书《春节谈话》一篇，是根据《毛泽东博览》上的“详版”和万岁本的版本两个版本整理而成的。

本书《谦虚——戒骄》一篇，是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和万岁本中的《谦虚——戒骄》一文整合而成的。

## 三、编辑有感

这部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伟大光辉的革命著作集，基本实现了全面、系统、完善地收录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五年主要著作的伟大目标，其中每一篇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文献，不仅具有学习意义，还具有很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首先，本卷中的一系列著作对大跃进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坚持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五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坚决的反对。例如《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这里，主席深刻、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领导的错误，离摊牌只差一步了。可是主席为了保持党的团结，始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教导全党力戒五风。到了五风恶果已经显现的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同志更加忧心忡忡，以至于大声疾呼：**“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其中“你们不跟我来贯彻”、“开除党籍”等语，足可见当时一线领导煽动、基层领导助力的五风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又如《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些话无不无可辩驳地体现了到底是谁在力克“五风”、谁又在干坏事、“头脑发热”的到底是谁，又是谁在毛泽东同志百年之后往死人头上扣黑锅。

其次，主席在这卷著作中形成了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是尖锐对立的”**这一重要结论，在他反复修改定稿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几段重要论述》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中，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等一系列著作中，又系统地提出了防止干部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和培养

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在今天看来仍具极大现实意义。

第三，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思想在这卷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观如今，凡是毛泽东同志批判过的错误教育路线，今天无不复活。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第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这卷著作中得到发展和完善。

第五，主席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世界革命的思想在这卷著作中得到完善。

我不禁感叹，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雄杰，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造就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纵观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著作，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文化、卫生、教育，社会科学、哲学各个领域无不涵盖，均有重要论述。故而：

想了解新中国历史的，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想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第一代领导的，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想要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有何发展，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面对当今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固化、贪腐浮夸成风、三和一少盛行、洋风席卷华夏的现实，想寻求解决之道的，需要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想要快速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结合社会现实，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拥毛的人，需要读他的著作；反毛的人，也要读他的著作——没有了解做基础的批判无异于痴人说梦。

总之，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将永远在前头指引我们奔向胜利和光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将无可阻挡地开创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意见沟通渠道**
**邮箱：**lwj20120704@163.com
**知乎：**@润旗之赤
**网易云音乐：**@润之赤旗
**百度贴吧：**@小胖鹅 home

**润之赤旗**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谨识

## 再版说明

亲爱的同志们：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润之赤旗版）与同志们见面后，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个多月以来，编者听取了网络上很多同志对于本书编排的宝贵意见，同时又与其他多本文献集做了比较参考，对本书进行了修改，谨推出《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润之赤旗版）3.0 新版。本版的主要修改如下：

一、增补三篇重要文稿：《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二、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重新整理了《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纪要》；

三、删除了一篇发表时间不明的文稿《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四、删除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节，因其与《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的内容重复；

五、解决了排版时每段前的空格问题；

六、修改了部分文稿的标题；

七、对部分文稿进行了一次校阅，对部分错别字、标点符号的错讹进行了一些修改。

请各位已经在云盘中保存本书上一版的同志，尽快换用本版本。本人百度网盘中上一版的分享链接即日取消。谢谢合作。

还请各位革命同志继续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润之赤旗**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谨识

（封底）